

※ 日本考證學研究專輯 ※

日本考證學派的成立 ——以大田錦城爲中心

金谷 治著 連清吉*譯

前 言

江戶後期儒學，先有折衷學派，考證學派則繼承折衷學派而臻於全盛期，是學界皆承認的事實。考證學的學風，已見於早期的諸學派，如中山久四郎的《考證學概說》^①即以仁齋、徂徠爲考證學的先驅，至於東涯或徂徠一門之外，新井白石等人亦有考證學的研究成果。雖然如此，以考證爲主而傾注全力於經典考校，以至於學者輩出而考證之學風靡於世的，是寬政以迄文化、文政時期。在日本考證學發展上，具有決定性關鍵意義之中心人物，是文化元年(1804)出版《九經談》的大田錦城。在此，以大田錦城爲中心，探討日本考證學派之成立與清朝考證的關係，究明日本考證學派成立的經緯及其學術性格。

首先，個人的關心在於錦城的《尚書》學。《尚書》即《書經》的考證研究，是清朝考證學的顯學之一，錦城的考證學亦以《尚書》的考證爲最精密而聞名於世。在檢尋錦城的《尚書》學中，其參採了多少清人研究成果，立即成爲問題的焦點，至於其如何而能繙檢清人著作，也是問題的所在。欲解決這些問題，則錦城與幕府醫官多紀家的交往情形，就有深究的必要。因此，問題的探究就超越了《尚書》學考證的領域，而發展成考證學成立的問題了。

歷來對於日本考證學的研究並不多，而近年尤甚。其理由大抵以之爲清朝考證學

* 連清吉，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文化環境講座副教授。

① 中山久四郎：〈考證學概說〉，《近世日本の儒學》（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有關日本考證學的論述，除此論文以外，頗參採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學史》（東京：富山房，1939年）。

的旁枝，甚且視之為陳腐的古典之學，與新思想了無關涉而遭受輕蔑忽視。但是個人並不以為然，事實上，考證學揭開了江戶後期思想的嶄新局面，因而值得深入研究。

一、大田錦城的考證學

大田錦城，名元貞，字公幹，通稱才佐，加賀大聖寺人。明和二年(1765)生，文政八年(1825)歿，享年六十一。為江戶後期的碩學鴻儒。其主要著作，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有寬政三年(1791)，於二十七歲時完成《中庸考》和《論語大疏》。寬政七年，三十一歲時，撰述《疑問錄》。文化元年(1804)，四十歲，刊行《九經談》。文化十年，四十九歲時，刊行《梧窗漫筆》。文政四年(1821)，五十七歲時，完成《仁說》。文政六年，刊行《學庸解》。翌年，即死前一年的文政七年，撰寫《梧窗漫筆後篇》的序文。撰述《中庸考》和《論語大疏》的寬政三年即清朝乾隆五十六年，去世的文政八年即道光五年，就清朝的年代而言，大田錦城是活躍於乾嘉後期的學者。除上述的著作之外，錦城尚有文集《錦城文錄》，詩集《白湯集》、《鳳鳴集》，詩文集《春草堂集》及為數甚夥的經書抄本的遺稿^②。茲概觀主要著述的內容。錦城早歲所撰述的《論語大疏》是抄本，乃蒐集諸家注釋之精善者而成的。據《九經談》卷五的說明，此書是以古注為主，古注有不通之處，則採朱注，朱注有不通者，則以明朝諸家注解補足，並加以己說。至於日本前賢之說，如仁齋、徂徠、宇野明霞的注疏，亦有所援引。大抵而言，《論語大疏》只是折衷學派式的集釋性著作，缺乏考證學的特色。《疑問錄》是條列宋學的問題所在而進行批判的著作。此書的特色在於其批評的方法並不是主觀性的批判，而是客觀的考證性批判。如仁齋的《語孟字義》或徂徠的《辨名》的論述，乃博引古典著述而實證地校訂朱子的誤謬。二者是以反朱子學的一貫思想立場為根底，而進行的朱子批判。但是錦城的《疑問錄》則以為朱子所謂的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乃出自於《首楞嚴經》的本然性、和合性。至於事理一致的主張，則因襲唐杜順的華嚴法界觀。換言之，錦城是以客觀性的

^② 錦城《中庸原解》卷末附載其門人荒井堯之〈錦城大田先生著述日記〉，羅列不少未刊著述。石田公道：〈大田錦城の尚書學(一)〉，《學藝》第1部第3卷第1號(北海道學藝大學，1951年)蒐訪《尚書》學之寫本資料，惜未完而止。一九八三年，石田氏饋贈錦城著《梅本增多原》四卷二冊之寫本，特此申謝。

論證，來證明朱子學並非儒學的正統。亦即《疑問錄》並非從反對朱子學的思想性立場，做哲學性的批判，而是技術性的形式批評。因此，《疑問錄》一書既已具有考證學的性格，書末所謂「斷不以程、朱為非，予以所疑，問奉其學之人而已」，未必只是謙遜之辭而已。

《九經談》凡十卷，首有〈總論〉，其次《孝經》、《四書》、《尚書》、《詩》、《左氏》、《周易》九經的論述，論說的方式是列舉諸家之說，而後展開自身的見解。考據之精密，足以誇示前賢。有關儒家經典，特別是《五經》的探究，不但博蒐網羅，而且細密議論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故《九經談》的評價甚高，錦城的聲聞亦震鐸一時。猪飼敬所(1761-1845)的〈標記〉（收載於《日本儒林叢書》第六卷《九經談》卷一欄外）盛稱錦城「識見正大，援引宏博，竊謂海內無二。不意今日有斯人。稱嘆之餘，標記鄙見以還之」。《九經談》隨處可見錦城自著《疑問錄》、《大學考》、《壁經辨正》、《梅本增多原》、《論語大疏》、《易學象義》等書名，可見此書乃撮集所著諸書之精要而成，誠為錦城的代表作，也是其考證學成型之作^③。

《梧窗漫筆》共有三編。正編的〈序文〉撰寫於文政六年，後編的〈序〉在文政七年，第三編的〈序〉則在天保十年。可知是由於廣獲佳評而逐次刊行問世的。《梧窗漫筆》的內容旨趣，由門人戶谷惟孝《後編·序》所說：「錦城先生往往為門人小子講袁了凡陰騭之學。曾筆其意為筭記，名曰《梧窗漫筆》。」可知此書乃以向世俗講述實踐性道德要義為主旨。其中歷史故事、古典引證的所在頗多，亦顯示出錦城的博識。由此書可以窺知錦城的思想主旨，至於考證學的尖銳性筆觸則較為舒緩。換句話說，《梧窗漫筆》的著述，顯示出錦城對現實的關心逐漸增強，也是其晚年心境的表徵。

通過以上的敘述，錦城的學問傾向，大抵可以明悉。考證學圓熟的代表作有《疑問錄》和《九經談》。至於錦城，未必只是考證學者的事，又由於《梧窗漫筆》的存在可以窺知。茲先以《九經談》十卷，考察其考證學的持論。

錦城的考證學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對宋學批判的考證性態度。（見於《九經談》卷一，以下簡稱卷一）其對宋學的批評，詳述於《疑問錄》、《學說指

③ 〈漁村海保府君年譜〉（《日本儒林叢書》第十四卷所收）之文化元年提到：「此歲大田錦城師，以所撰《九經談》十卷付之梨棗，學者宣傳，盛名噪一時。」

要》、《宋學辨》等書，《九經談》則綜輯以上諸書而撮要論述。如「周茂叔所謂無極而太極。無極二字出于老、莊、列子。而『無極而太極』則出于唐僧杜順華嚴法界觀。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亦出于唐僧澄觀華嚴大疏」（卷一）。即條列宋學的概念，實證地指陳宋儒語句乃出自於老、莊、佛家之說，為《九經談》的首要旨趣。亦即申明宋學體系的底據並非正統的孔子的儒學，藉以傾頹宋學的思想架構。再者，摘取程明道儒佛一致之說，朱子佛、老之說亦近於理之說（《中庸章句》），以為宋代儒學參採佛、老之說的明證。甚且指出今本朱子章句、傳注也未必符應朱子的真義。錦城列舉《孟子集注》之言與《朱子文集》之說有相互矛盾的所在，以為明證。即朱子的學問亦有所變革，不探究其所以而盲從現今通行之書，即可十足地理解朱子之學的持論，是不正確的。

錦城是用此一方式進行宋學批判的，故可稱之為考證性的批判。徂徠等人亦以為朱子之說未合於古人，而列舉古典訓詁的用字例作為實證。雖然如此，其所以考證之主觀性思想立場，始終溢於言表而難以掩蓋。因此，錦城說徂徠「又頗知考證之學，然而其所考證，往往失當」（卷一），則是持平之論。至於仁齋，錦城則以為「所長不博，而乏考證」（卷一）。錦城所推崇的是仁齋之子東涯。其謂東涯「博雅多識，當時無比。其所著作，皆有用之書。經義辯駁宋學，十得七八」（卷一）。雖推衍家學傳承的所在，「多不醇正」，然「學問之博，著述之富，為我邦儒先之第一矣」（卷一）。即不從思想的觀點，而就學問研究的角度，稱許東涯的成就。

於此亦可窺知錦城的學問立場。唯其學未必是承續東涯的，而是受到清朝學問的影響較深。如於朱子所用《河圖洛書》、《太極圖》的批評，則稱具見於毛奇齡、朱彝尊之說。至於周茂叔為二程子之師，乃朱子杜撰之說，而非事實的指陳，亦根據朱彝尊《經義考》而議論的。由此可知，錦城於宋學的批評，頗受清人影響的。至於錦城學問與清人的關係，待後文詳細考察。

錦城雖然對宋學有所批判，卻未必完全否認宋學，相反地，其對朱子的學問極為尊崇。錦城說：「三代以後人物，予服二人。孔明德業、晦庵學問是也。」（卷一）二程子與朱子學問的缺點在於「浸淫乎佛、老」（卷一），故實證以明之，以喚醒世之盲信宋學者。錦城雖嫌惡「世之奉宋學者視晦庵甚高，與孔、孟無異。故雖知其誤，多方回護，不欲顯其短也」（卷一）；但是錦城又以為「宋儒大意，繼往聖而啓來學，排佛、老之空妙，擯管、商之功利」（卷一）。故「字字句句守其

遺說」(卷一)的態度是有所差失的。錦城進而指出「予不信宋學，而喜人之為宋學」(卷一)之學問立場，即宋學有長亦有短，錦城則否定全面盲從宋學的治學態度。

重要的是，其對宋學的態度，與對漢學、對仁齋或徂徠的古學是一貫的。其批判「世間奉宋學者」之後，接著也對「世間奉古學者」進行批評。其以為古學者卑視朱子，揭發朱子學的缺失，尤有過甚者則完全不讀朱子之書，乃與宋學信奉者同為愚蠢之人。漢學與宋學各有長短，錦城以為其準據在於是否「合乎經旨」(卷一)。符合經義，則不論是誰，其言皆是；不合經旨，雖名儒之言亦不可信從。錦城之所以抒發此一議論，乃是基於徂徠學流行而興起的激烈的是非論辯與門戶之見，反對徂徠學派而形成折衷學派，幕府頒行異學禁令(即一七九〇年的寬政異學之禁)的儒學思潮流變的學術背景。錦城的這種持論可謂是公正持平的學問態度，此與考證學的學問態度不無關係的事實，亦可推察而知。

有關《九經》的論述，亦大抵以旁徵博引的方式，探討各經的主要問題。其中考證最為精密的是《尚書》的論述(卷七)。錦城標題為「梅本增多小辨」，乃撮舉舊著《壁經辨正》與《梅本增多原》的要點，綜輯而成的。所謂「梅本」是指東晉梅賾上獻漢孔安國傳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缺〈舜典〉一篇)，即現今所傳的《尚書》(自〈堯典篇〉分出〈舜典篇〉)。所謂「增多」是說與以前通行的秦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相比，梅本所增加的篇章。錦城的考證，旨在證明梅本增多的諸篇與孔安國的《傳》，皆為王肅(195-256)之徒的偽作。

《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的關係，是《尚書》學史上極其重要的問題。由於清朝考證學輝煌的研究成果，《古文尚書》增加的部分，是後代的偽作，在今日已成為定說。但是在大田錦城時代的日本，大抵無人留意此一問題。《尚書》卷首所載的孔安國〈序〉文與古來傳承的情形，唐《尚書正義》做以下的說明：

孔子整理的原本有百篇之多，秦伏生所傳二十九篇是焚書以後的殘餘。其後，孔子舊宅發現比伏生今文(隸書文字)經典為多的大部古文(古體文字)經典，此為武帝時博士孔安國家傳的經典。唯當時傳誦流行的還是今文二十九(八)篇，孔安國的古文，其後竟不知所以了。東晉梅賾發現孔氏古文，乃上獻朝廷，此即今本《尚書》。

據此敘述，則古來相傳的《尚書》的內容，完全承續孔子而來，是往古的著作。即使漢代有今文與古文的區別，也僅僅是書寫文體的不同，並無真偽的問題存在。這

是一般對《尚書》的看法。特別是朱子學領域中，僅閱讀蔡沈《書集傳》，一般亦未必具有此一知識。

中國首先對《尚書》存疑的，是宋吳棫和朱熹(1130-1200)。朱子以為今文的文章為古風而難解，何以古文增加的部分卻易讀，因而存疑。再者，孔安國《傳》的文章亦不似漢人所為。其後，元吳澄等人繼承朱子之說而斷定增多的部分為偽作，唯未有足以讓人認可的實證性論證。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則以精密的考證為底據而斷定古文為偽作，而成為定說。與閻氏抗衡而護衛古文的，是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唯毛氏之說大抵不為學界所認可。

根據錦城自身的敘述，其於十七、八歲時即懷疑《古文尚書》為偽作，讀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而嫌惡其強辯，乃撰述《壁經辨正》、《梅本增多原》二篇。《九經談》於《書》的論述，即《梅本增多小辨》乃綜輯舊書二篇以成，於四十九歲時刊行的。其首先推崇吳棫、朱子的慧眼，指陳毛奇齡論辨的誤謬。進而以為增多二十五篇的經文與孔《傳》，都是始出於晉朝，在此以前的漢、魏皆未見。漢人偶而引述增多之文，亦僅限於《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的引用而已。後漢時，有杜林的《漆書古文》，馬融曰：「逸書十六無解說。」以「逸書」為孔安國的真古文。唯壁中發現的真古文，始終藏於祕府而未流傳於世。梅賾上奏者為後出的偽作。毛奇齡謂梅賾上奏的只是孔《傳》，而此孔《傳》亦為偽作，至於經文則為真古文。實則毛氏之說有誤，梅賾上奏的是古文經文和傳文^④。

錦城列舉實證以敘述其論旨後，進而證明古文增多的經文與孔安國的《傳》文都是魏王肅之徒的偽作。梅賾是東晉之人，增多的古文既已為西晉皇甫謐、郭璞所引用，可見增多的古文於魏、晉之際已出現。何以錦城以之出於王肅之徒？於此有詳密的考證，雖頗煩雜，茲列舉其一二：

1. 〈洪範〉篇七稽疑的「驛」。在漢代，此「驛」字，孔安國古文作「涕」，伏生今文作「圉」，後漢鄭玄解釋曰：「圉，明也。」今本「驛」字是根據梅本，偽孔《傳》注釋之為「氣落驛不連屬」。王肅引出鄭玄注而謂「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則與偽孔《傳》的注疏類似。故今增多本與《傳》文出於王肅之徒的可能性甚高。

^④ 由於閻若璩指摘孔安國《傳》之文中，有後代之名，毛奇齡終不能為孔安國《傳》辯解，但謂梅賾僅上奏《傳》文，藉以庇護古文之經文。

2.〈罔命〉篇有「巧言令色」一辭，偽孔《傳》解釋為「巧言無實，令色無質」，此與《論語》王肅注完全相同，又是王肅之徒偽作的證據之一。

3.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敘述王肅《尚書注》曰：「始似窺見孔《傳》。」隋陸德明、唐劉知幾亦曰：「王肅注《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殊不知孔《傳》出於王肅之徒的偽作，多用王肅之說，故孔《傳》與王肅注類似。今本孔《傳》出於王肅之徒，由此益明。

錦城的考證大抵與清朝的學者一致，結論也類似。二者的關係尚待詳考，唯如此精密地論述《尚書》的問題，並揭示其偽作的跡象，在日本儒學界是劃時代的考證。因《九經談》的刊行而使當時學界對錦城的學識推崇備至，實則在《尚書》學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義。再者，和宋學的批判一樣，錦城也不認為《古文尚書》為偽作，即應廢棄不顧，相反地，其在《九經談》卷七指出：「真偽之論與用不用殊」，不但「古《尚書》逸語，皆在此書」之中，而且「多取《語》、《孟》諸書之意以作之，故無違於道義者，蓋其精巧非他偽書之比。其作之者，卓然名家，非王肅為之，則肅之徒高足者為之耳」。至於其晚年所撰述的《梧窗漫筆後編》也說「以禮制心」一語雖出自偽書〈仲虺之誥〉，卻為「妙語」，故「偽書二十五篇……易讀易解，切實于人事治道者多，……雖為偽書，不可廢棄也」。即辨別真偽的治學態度與由實踐性關懷而生的「辨知益于聖教之事」而利用之的態度，判然分別，是錦城學問的基本立場。

與此立場有所混淆，卻過於尊重經典的實踐性而缺乏詳審考證的，是有關《孝經》的論述（《九經談》，卷二）。大田錦城以為《古文孝經》的孔安國《傳》和《今文孝經》的鄭玄注為偽者，是因襲中國歷來的存疑而非有新義，至於《孝經》本文，只質疑古文〈閨門〉章，「非君子之言」，其他則毫無論述。相反地，對南宋玉山汪氏、沙隨程氏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甚且以為朱子《孝經刊誤》的糾謬刊誤是可有可無的。錦城以為《孝經》的主旨在於愛敬奉養，於道之綱要的闡述，極其完備，足與《論語》、《禮記》匹配。因此，錦城說：「晦庵先生不疑《論語》與《易·文言傳》之奪《左氏》，而疑《孝經》之襲《左氏》，則亦偏矣。古書之相襲而有出入異同，是其常也。當論其義理當否如何，而不可執彼而疑此也。」

品隲《九經談》的豬飼敬所，對錦城於《孝經》的論述，一一辯駁。豬飼敬所以為「朱晦庵之所疑，極有精義」。《論語》於孝的論述，「唯以事父母之道而已矣，《孝經》以一孝字，總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立言大有逕庭，不可謂與

《論語》相符合也」。豬飼敬所的批評頗為切當，雖然如此，錦城說：「六朝之人極尊《孝經》。」而且博引史傳以為事例，以證明之。由此可知錦城頗尊崇《孝經》。也由此可以窺察錦城埋首於精詳考證學問之外，亦有解經者「當論其義理當否」的道德意識。

《孝經》的論述之後是《大學》（卷三）。《九經談》探究的論述未必有完全敘述的必要，但是朱子學尊奉之為「初學入德之門」，而伊藤仁齋卻以為「非孔氏之遺書」的《大學》則有一顧的價值。《九經談》卷三所載《大學》的論述，與錦城所著《大學原解》相互補足，故篇幅甚長。錦城首先推崇程、朱表彰《大學》的功績，蓋「《大學》之書，與《中庸》、《孟子》相表裏矣。……聖道大綱，發揮無餘，孰如此書之精妙乎」。雖然如此，「晦庵之解，多不可信」，故改朱子「大學者大人之學」之說為「大學者學宮之稱」，也批評朱子分別經傳，作補傳之舉。再者，於改置經文上，雖贊同移〈誠意〉一章至〈正心〉章之前；卻反對〈淇澳〉章的更移與「知本」一句為闕文殘簡的主張。又以程伊川「改親民作新民，千古定說」；但是解「明德」為「虛靈不昧」，乃採《大智度論》之說，不可從。所謂「明德，是諸善行之總名」，無相反的「昏德」。換句話說，錦城以為「明德」之「明」並無特別深微的意味。至於「格物」之「物」與「道」同義，「格物」即極盡道德，故朱子的窮理說與《孟子·盡心上》的「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是有所矛盾的。

一般而言，錦城於經典的解釋，大抵不採朱子窮理說之哲理性詮釋，如其對《大學》的理解，始終以之為實踐性道德的儒家經典。此乃古學派反對宋學「理」的哲學，而以「氣」的現象世界為第一義的基本立場。《梧窗漫筆後編》卷上所載：「天地，形氣而已，然其中有不可思議之神靈，司吉凶禍福。人身亦形氣而已，然其中有不可思議之神靈，仁義忠信自是而出。然則天地萬物無非氣也，自氣中而出種種之理也。……宋儒理氣之說……晦庵云先有此理者，不宜之說也。事物之法則即道之事也。」^⑤誠足以說明錦城的思想立場，也是支撐其考證學之實證精神的所在。

錦城於《大學》的論辯，皆有實證性的根據。如對於「明德」的解釋，即博引

^⑤ 《九經談》卷三提到：「道德一致，以其所由謂之道矣，以其所得謂之德矣。」即未以道具有形而上的哲理。

經傳的用字例，而列舉為數極夥的同義例證，以界定其意義。至於《大學》經文的異同，亦以此方法而辨明《禮記》本、朱子《章句》本及其他數種板本的源流系統。又縷列三十數家的注解，以說明自身的見解近似明人崔銑的《大學全本通釋》。乍見其論述，無不驚嘆其博識；實則錦城並未通覽其列諸人的著作，而是參採朱彝尊《經義考》（卷一五七至一六〇），加以考證性系統別類，以成自說。雖博採通說，又有實證性考索；但行文並未標識所自出而若己身搜訪而得，故不免遭受非議。《尚書》的考證，亦有此弊端。

《妙妙奇談》是當時通俗的書籍，第七回中即有一段揶揄大田錦城的文字^⑥。

先生……踏階梯子皆古人也。日本則仁齋、徂徠、太宰、南郭，唐山則漢後諸人，近清人有毛奇齡、朱彝尊、黎立武、顧炎武等。先生以右諸人發明之事為踏階而自登樓臺。……書篋有鑰，但標書名者，先生未付梓之著述也。

謂錦城以先人研究為己說，列舉多數未示諸人的著作書名，以欺世人。又錦城一時之師的山本北山亦著述《笑堂福聚》^⑦的通俗之書，雖未標示錦城之名，卻謂王鳴盛伸冤於冥府，以揶揄錦城。王鳴盛（1722-1797），乾隆時的考證學家，著有《尚書後案》一書，《九經談》中亦見其名。《笑堂福聚》以錦城的《尚書》學乃剽竊王鳴盛的《尚書後案》，故王鳴盛於死後的世界控訴大田錦城。猪飼敬所原本不知《笑堂福聚》所詆毀的是何人，繙讀《九經談》之後，始知所指的人是大田錦城（《九經談》，卷五，〈二百十九評〉）。因此可知，錦城的考證學乃引述清人的研究而非其獨創的批評，於錦城在世之時即四處傳聞了。

藤田幽谷的〈錦城先生墓表〉說：「名之所在，謗亦隨之。」即以錦城負有盛名，故遭嫉攻訐。錦城亦自謂：「僅踰弱冠，既有定見，資性倔強，不願立人之門牆。」（《九經談》，卷一）即性情剛烈，不輕易屈於人下。松村操《近世先哲叢談正編》謂錦城「不事矯飾，甚有口辯」；信夫恕軒《如軒漫筆》則非難之曰：「錦城每喜罵詈先儒，不似君子口語。」錦城有此性格，終不免遭受謗議。唯問題在於中國考證學與大田錦城的考證學上，茲盡其客觀地探究此一問題。

首先羅列《九經談》所見清人及其著作之名。《九經談》引述顧炎武（1613-

⑥ 周滑平作《妙妙奇談》（《隨筆大成》第三期第四卷所收）第七十四，〈蛆蠅作奇詩〉。

⑦ 據《九經談》卷五，猪飼敬所〈評二百十九〉之文。《逢原紀聞》（《日本儒林叢書續編（二）》所收）記載：朝川善庵勸諫其師山本北山輟止出版之念。

1682)《日知錄》、胡渭(1633-1714)《大學翼真》、毛奇齡(1623-1716)《西河合集》、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余蕭客(1729-1777)《古經解鈎沈》、閻若璩(1636-1704)《尚書古文疏證》、全謝山(1705-1755)《經史問答》、徐乾學(1631-1694)《澹園集》、紀昀(1724-1805)《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江聲(1721-1799)《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尚書後案》等。其中引證最多的是毛奇齡和朱彝尊。毛氏之名屢見於《九經談》論述《大學》、《中庸》、《論語》、《詩》、《書》、《左傳》、《易》各卷；朱氏的引用則在《論語》、《詩》、《書》，至於其未明言為朱彝尊所述，如上文《大學》的論述，引《經義考》的資料而未注明出典者，各卷隨處可見。因此，大田錦城精讀參採《經義考》和《西河合集》是確鑿可考的。《九經談》各卷中，引述清人著作最多的是《尚書》，其次則是《大學》。錦城之《九經談》中，《尚書》的考證是最為精審的，其與引述清人著作最多的現象有密切的關連。換句話說，錦城的考證學與清人的考證學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未必如《妙妙奇談》所說的，錦城只是模倣或抄襲清人學問而已。茲細考錦城《尚書》論考與清人學問的關聯問題。

錦城於《尚書》的精密考證與清人的近似是事實。如《古文尚書》自孔氏舊宅壁中出的時代是漢景帝之時而非武帝末年的考證，見於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一。上文所述〈洪範篇〉「驛」字的考證，王鳴盛《尚書後案》卷十二亦有類似的考辨。諸如此類的論證甚多。唯〈洪範篇〉的考證情形，《尚書古文疏證》並未以之為主要問題而詳細考察，只是附加說明似的輕描淡寫而已。至於《尚書後案》所論考的旨趣，與錦城亦有不同。錦城以經文作「驛」與其解為「連續」而言，孔《傳》與王肅相似，故為王肅之徒偽作的證據所在。王鳴盛則以「驛」字和前出之「蒙」字相比對，鄭玄以之解為明暗之比對；孔《傳》與王肅則解為連續與斷絕，可知《古文尚書》乃東晉之偽作。換而言之，王鳴盛不但考證精密，訓詁亦極其明確；錦城或參採《尚書後案》之說而簡潔扼要地論考。雖然如此，亦不能以為錦城只是輕易地傳抄而已。再者，前文列舉的三條考證中的第三條，錦城列舉孔穎達、陸德明、劉知幾之說以為考證，王鳴盛《尚書後案》卷三十一，亦有同樣的論述，則此項與〈洪範篇〉相同，錦城確實參採王鳴盛之說。但是第二條，有關「巧言令色」的解釋，就個人所見，《尚書後案》並無論述，乃錦城自身的見地。故錦城之博學與獨創性見解未可完全否定。

錦城的考證與清人關係的問題，錦城自身也頗在意，其辯解與清人見解一致是

「暗合」。如散見於兩漢之《古文尚書》（「後漢古文即前漢古文，杜林漆書即安國傳本，賈逵之學即安國之傳」〔《九經談》，卷七〕）皆同一之真本，乃「自以為是獨得之妙，發前人之所未發矣」（《九經談》，卷七）。然則王鳴盛亦有相同的見解，錦城則稱王氏之說與己「暗合」。唯王鳴盛所說，並非其獨創，乃根據徐乾學之說而持論的。又見最晚海舶傳入日本的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始知此說自若璩發之」（《九經談》，卷七）。至於顏淵享年三十一而非四十一的考證則與毛奇齡一致，而說：「講經之士，精細考古，則其所見不期而暗合昔人者往往有之。予向辯駁《尚書》梅本，著《壁經辨正》、《增多原》二書。後數年，得王鳴盛《尚書後辨》讀之，其中往往有暗合愚說者，是皆予諸友所知。近聞有忌克忮忍之人，好毀讒人，其惡暗合二字，故予亦不欲言之矣。」（《九經談》，卷五）

品評《九經談》的豬飼敬所，對錦城所謂的「暗合」，甚為贊同。豬飼以自身亦有此一經驗，而斷定「此事之當然者，固不為奇也」（《九經談》，卷五，〈二百十九評〉）。當然，亦有和豬飼所說相反的，以之為掩飾自身之非而強為辯解之詞。雖然如此，未必有此存疑的必要。重要的是錦城對王鳴盛抱持的態度，錦城以為自己的見解和王鳴盛一致，在錦城的字裏行間未必不透露出王氏考證精密細緻之感^⑧。因此，錦城是否能證明在繙閱王鳴盛《尚書後案》之前，既有自身的見解，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上文既已敘述及之，根據錦城所論，其《尚書》學的形成有幾個發展的階段。茲考察錦城的事蹟及清人著作舶來的情形，對於此一問題或許能得到某種程度的解答。

根據《九經談》卷七的載記，錦城懷疑《古文尚書》為偽是在十七、八歲，於越前對伊藤良弼說的。此為第一階段。其後，學經十年，愈知其非，既而讀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憎惡其強辯，乃著《壁經辨正》、《梅本增多原》。此為第二階段。唯以二書篇幅甚長，又細密太過而難以刊行，乃撮其旨要，成〈增多小辨〉而編入《九經談》中。此為第三階段。其識誌為「寬政戊午六月」和「寬政戊

^⑧ 如上文所述，錦城以兩漢真古文之說，與王鳴盛之說暗合。又其以此說非王鳴盛之創見，乃前承閻若璩之說。至於上獻古文於漢武帝者非孔安國本人，乃是孔安國死後，家人所為之說，亦與王鳴盛一致，唯此說亦非王鳴盛之獨見，乃出自朱彝尊。推敲錦城之意，其於王鳴盛頗有微辭。

午八月」，即寬政十年(1798)，錦城時年三十四歲^⑨。至於《九經談》的刊行，是在文化元年，撰述完成則在前一年，即享和三年(1803)，錦城三十九歲之時(據〈大學原解序〉)。

茲以錦城《尚書》學形成的過程放置於其生平事蹟中，作一考察^⑩。大田錦城出身於儒醫之家，十歲時，家業託付給其兄而自己志在儒學。根據日後與龜田鵬齋的書簡所載，十五歲時，感嘆北方偏鄙之地，既乏師友，又少書籍，乃出遊京都，唯不滿足於都下名士的學問，移居南越三年，二十歲時，始至江戶(《春草堂集》，卷上)。即十八至二十歲時，錦城在越前，在此之前則遊學京都。又據其所著《尚書古今文同異考》卷二的記載，七歲的時候開始，從其兄伯恒(檜田北岸)句讀《詩》、《書》，十八歲時，出遊越前，與年稍長的伊藤良弼友善，時議論《尚書》今古文之義。一日，六十餘歲之隱者謂之曰：「今之古文非真古文。」雖然，據井上喜雄的錦城事蹟研究指出：錦城出奔京都是在十六歲，而且不久即被帶回故里。錦城與龜田鵬齋的書簡不免言過其實。又授於六十餘歲之隱者的敘述，亦頗可疑。十歲志於儒學，至弱冠而有成，此由其出江戶以來的狀況觀之，固無可疑；唯既已懷疑《古文尚書》為偽作者，則未可確信。由此看來，錦城《尚書》學形成的第二階段，才是最重要的。

錦城遊學江戶之初，曾入於山本北山(1752-1812)的門下，唯以其人學識品德皆甚拙劣而辭去。其後，得幕府醫官多紀氏的協助，列席儒學的講授而濟其窘困。其間，於二十二歲時，曾寄書京都的皆川淇園，求入其門而未果(《春草堂集》，卷三)。雖然，知交於吉田篁墩等一時名儒，且於二十四歲時，即獲多紀氏稱揚之為「考證精博」(《春草堂集》，卷五)。此時期的治學與交友情形詳於後文。錦城與皆川淇園書簡中，舉明之郝敬與清之顧炎武，而謂「皆僕平生所欽慕也」。又

⑨ 〈漁村海保府君年譜〉寬政十年：「此歲，大田錦城《壁經辨正》稿訖，于時年三十四。」此二書之解說，採石田公道之說(前揭論文)。

⑩ 錦城事蹟見井上善雄著《大田錦城傳考》上、下(加賀市文化財專門委員會，1959、1973年)論考精詳。錦城之友人藤田幽谷的〈墓表〉，門人海保漁村的〈年譜〉亦可知其梗概。錦城所著《春草堂集》二十一卷(影印前田家本)尤為珍貴。此書乃天明三年(錦城十九歲)至文政二年(五十五歲)所作詩文、書札之編年體的文集。錦城之著述生平，由此文集而得以詳知，井上氏之著作，乃長年積累的成果，利用頗多未公開的書簡，頗有助於錦城生涯的解明，誠極其貴重的研究著作。此書上卷既已絕版，承加賀市教育委員會郵寄供閱，特此申謝。

說：「所最欽慕者，秀水朱竹垞氏學最該博，論最公正。……僕所期程，亦在此公矣。……僕聞蕭山初晴居士（毛奇齡），近世大家先生所最推尊也，其《西河集》，僕未見其書，近約借此一藏書家，其得之有日矣，果不知此書亦能補經也否。」由此可知，錦城在於二十二歲時，即推崇朱彝尊之學，且尊奉顧炎武，而欲借閱毛奇齡而窮究經義。從《九經談》的引述情形而言，其精讀朱彝尊、毛奇齡的究竟，蓋可由錦城〈與皆川淇園書〉推察而知。因此，錦城《尚書》學形成的第二階段確實有其重要意義。

《經義考》、《毛西河集》與《音學五書》具見於《寶曆己卯（九年，1759）齋來書目》^①，即在寄書皆川淇園的前二十七年前。但是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初見於《享和三年載來書目》，享和三年（1803）即《九經談》完成之年。此與《九經談》中，錦城所謂《尚書古文疏證》「海舶載來最晚」（卷七）一致。錦城目睹《尚書古文疏證》恐驚嘆其精到，亦以「暗合」者不少而甚感自負。然則問題所在於王鳴盛《尚書後案》到底如何。此書見載於《寬政三年載來書目》，寬政三年，一七九一年，錦城二十七歲，即錦城《尚書》學形成的第二階段，亦即在錦城撰述《壁經辨正》之前，有已經繙閱《尚書後案》的可能。所謂王鳴盛訴訟於冥間的諷刺，亦據此而言。雖然如此，錦城所稱的「暗合」，是否爲事實一事，未必能從此書傳來的時期作爲判準。就錦城的生平事蹟看來，錦城在二十七歲時，既已具有相當豐碩的學識，又由於與王鳴盛神交而察覺在《尚書》研究上，有不少「暗合」之處。《九經談》所載〈梅本增多小辨〉的成稿，或有修飾王鳴盛之說以成的所在；但是基本上，錦城所說的「暗合」是可以確信的。

決定錦城是否抄襲《尚書後案》，並非問題的核心，或有稍嫌過於深入的所在，重要的是錦城接觸清朝考證學而形成其學問的過程。可以確信的是在錦城學問形成上，有舉足輕重的清人著作，首先是《經義考》，其次是《毛西河集》，至於徐乾學的《澹園集》也有其影響性。《尚書古今文同異考》或許是整理《壁經辨正》而成的著作，由此書第三卷的載記，可知錦城自多紀元簡家借閱佐伯毛利公所藏的《澹園集》，讀〈古文尚書考〉後，始知越前隱者所言與之相似的事。

《經義考》卷七十四的〈古文尚書〉詳載了歷來的論辯，故而引發解決其僞作

^① 《齋來書目》乃根據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年）。下同。

問題的意念。雖然朱彝尊以爲近出之《尚書古文疏證》與《古文尚書冤詞》皆極端之議論，乃進行部分的探索，而作折衷調和的結論。然則，問題並非止於此的事實是不辯自明的。至於《古文尚書冤詞》則極力辯護《古文尚書》，探究真偽問題的相關文獻幾乎搜羅殆盡。根據其卷首〈總論〉的敘述，當時中國學界將《尚書》的今文和古文分刊別行，上奏請求至日本訪求古文真本以解決真偽問題。由此可知以古文爲偽作的風潮廣被於世。錦城於〈與皆川淇園書〉稱其「所欽慕」之明郝敬，亦以增多的二十五篇爲偽作（《九經談》，卷二）。錦城精讀以上諸書，並深入思索考察，而發展成《九經談》所載〈梅本增多小辨〉的內容，誠爲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換句話說，錦城的考證學乃經由清人著作的引導而形成其獨自的見解。有關《尚書》的考證，就結果而言，雖與《尚書古文疏證》或《尚書後案》重複，也未必能凌駕其上；但錦城獨自完成的發展過程，在日本考證學的成立上，卻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梧窗漫筆後編》卷下，有綜輯古文增多之偽的文章，其於南宋以來大抵留意及之之後，曰：「至清人始辨明之。閻若璩《古文疏證》、王鳴盛《尚書後辨》，說其偽而盡矣。予亦少時著《壁經辨正》十二卷、《梅本增多原》十二卷，辯駁其偽。」即推崇閻、王於《尚書》學史上的決定性功績，也敘述自身於少時的研究成果。此可謂錦城晚年持平之論。雖然，至其晚年，對於太過細密的議論，既已不認爲有何價值了。因爲錦城接著說：「近世清人之漢學誠無用之學也。自余蕭客《古經解鈎沈》而至惠棟《九經古義》、《易漢學》之類，一無爲用。《尚書集註》、《尚書後案》皆同。……王鳴盛雖爲大家，十八年精力盡於《後案》之類，愚惑之極也。」錦城於晚年所推尊的清朝學者是經學以外，而專主目錄學、史學、詩文的紀昀、趙翼和袁枚三人。以考證學者無大見識的批評雖亦見於《九經談》（卷一），但是以之爲「無用」、「愚惑」則是其晚年的變化。此或表現出其伏首於清朝考證學的臣服意識。此一斷案姑且擱置不論。

以上，以《九經談》爲主而考證錦城的考證學及其與清朝學關係的情形。出生於北方偏鄙之地的大田錦城如何而得以接觸清人的最新著作，又在何等環境下，形成其考證性的學問，則是其次所要探討的問題所在。此問題既已超越錦城個人學問的範疇，而與日本考證學派成立的問題有著深遠密切的關聯。茲詳論於後。

二、大田錦城的交遊及當時學界動向

《春草堂集》末尾所載海保漁村的跋文，列舉了錦城交遊的姓名。當時的耆老井上四溟只是投牒請見而已，山本北山雖師事，不久即辭去，寄書請見皆川淇園而未果^⑫。於苦難窘迫中的知己是多紀藍溪及其子桂山。至於相談甚歡的友人則是山中恕之、小川誠甫、吉田篁墩、龜田鵬齋、藤田幽谷。至於醫官山田圖南，當時名流的大田南畝、近藤正齋，詩人大窪詩佛、梁川星巖，國學歌人村田春流、橘千蔭，書法家田中玉峰、秦星池等人亦有往來。其與北山、淇園的關係雖不能不探究，但與錦城關係最深厚的是多紀家及知交的友人。首先探討錦城與多紀家的關係。

多紀氏是代代為幕府醫官的名門，又為了振興醫學教育而興建「躋壽館」的醫學專業學校，而且廣為刊行醫學古典的注釋校刻。關於多紀家的事蹟，森潤三郎的研究頗為詳細，又根據富士川游《日本醫學史》的敘述，多紀家歸屬為江戶後期醫學的折衷學派或考證學。元德（藍溪）、元簡（桂山，1755-1810）父子和元簡的二子元胤（柳泚）、元堅（苴庭）三代為中心^⑬。「躋壽館」是元德之父元孝於明和二年（1765）興辦的私學，規模擴大而充實其內容的是元德。其後乃改隸為幕府的醫學館，由元德、元簡主掌其事。元德的醫學在排除古方醫學的武斷而提倡古今諸派折衷兼取的醫學。元簡發揮家學，著有《素問識》、《靈樞識》、《傷寒論輯義》、《金匱要略輯義》等不少考證性注釋書。亦校訂出版《醫略抄》、《本草和名》等古鈔本。著述立說之勤，知聞於當時。元簡長男元胤繼承家業，總理醫學館，著有《醫籍考》百卷，解題分類中國歷代醫書，其弟元堅任醫學館教授，除撰述《傷寒論述義》、《金匱要略述義》、《素問紹識》外，並擔任《醫心方》、《聖濟總錄》之校刻事業的總編輯，頗能祖述發揮其父元簡之業。元胤、元堅皆有子嗣繼承其業，省略不述。

^⑫ 錦城與皆川淇園之關係，海保漁村《春草堂集·跋文》曰：「唯聞其名，未見其人。」漁村之子元起編纂漁村的〈年譜〉的引文，以為長久保赤水之事，而未見皆川淇園之名。

^⑬ 森潤三郎著《多紀氏の事蹟》（青裳堂書店《考證學論考》收載，1933年刊、1979年）；富士川游：《日本醫學史》（東京：日新書院，1941年）。

富士川游的著書，於多紀家興學著述事蹟的敘述中，列舉儒學折衷學派井上金峨與考證學派山本北山、吉田篁墩、大田錦城、龜田鵬齋之名，以暗示多紀家學風受彼影響之關係。此為問題的關鍵所在^⑭。

錦城遊學江戶是在天明四年，時多紀元德藍溪五十三歲，元簡桂山三十歲，正是躋壽館逐漸昌隆之際。此年開始，外界的生徒被認可參加百日教育。除山田圖南、目黑道琢講授醫學專門教授以外，又增添了儒家經典的講授。井上金峨為首任教授，其後由吉田篁墩、龜田鵬齋繼任，錦城亦於稍後列席講授^⑮。可知儒學者與多紀家的關係非淺。井上金峨於躋壽館開創時，即被三顧規劃方策。多紀元德與井上金峨的交誼深厚，請託井上金峨教授其子元簡的儒學，金峨的墓誌銘亦成於元德之手。金峨的門下，即元簡的同門友朋，有山本北山、吉田篁墩、龜田鵬齋。篁墩與鵬齋皆任躋壽館的講師，和元簡的關係頗為密切。錦城則以學識而與元簡有深交，且為元簡子嗣的儒師。再者，元德的門下而與元簡有交誼的是伊澤蘭軒，蘭軒門下有撰述《經籍訪古志》之澀江抽齋、森立之。由此可知，多紀家與以狩谷掖齋為中心之漢、唐注疏學者流亦有關聯。蘭軒亦為目黑道琢的門人，道琢為推崇考證學風的學者，任躋壽館的助教。由以上的交遊關係看來，多紀家，特別是元簡，乃是聯屬當時考證學派的交集。

多紀家的學問也正是到了元簡，才真正形成考證學風的學問。其父元德的學問只能說是折衷，尚不能稱為考證。此與其所知交的井上金峨的學風相應。元簡的學問則有所精進。茲以其所著述的《傷寒論輯義》論述之。根據其序文的記載，其反對古學不取後世注家之說，但依經典原文而注釋的立場；廣搜宋、元以來數十家的解釋，「逐條歷考，旁及他書……開發其隱奧，臨證以辨疑，期處方而得精當」，乃著此書。著述內容亦無與序文乖違，就其體裁而言，乃博引衆說而加以案語，與書名《輯義》亦頗相稱。又傾注心力於本文的校訂，元簡之為考證學家的面目，躍然紙上。又據〈凡例〉的記載，《傷寒論》的版本有宋校訂本與金注解本兩種，又有所謂《金匱玉函經》的別本。諸書的引用或通行本皆由此而出。以宋本為底本，又據金本、玉函經本以為校訂識記的是元簡所校訂的《傷寒論》。首卷〈傷寒卒病

^⑭ 森鷗外《伊澤蘭軒》（十九），在論及吉田篁墩之死時，亦舉出篁墩之師井上金峨，以及井上金峨之師井上蘭吉臺二人，皆出身於醫家，而指出說：「醫家而治儒學者，多為考證學家，恐非偶然。」蘭軒、澀江抽齋皆與多紀氏同為醫學的考證學家。大田錦城亦出身於醫家。

^⑮ 多紀元堅：《時還讀我書》（《杏林叢書》，第2冊），頁269以下，詳細記述躋壽館的事情，又森潤三郎《多紀氏の事蹟》的〈醫學館〉一章亦有詳細的研究。

論集〉的注釋，除《說文》、《史記》的徵引外，又旁及儒家經典，誠值得留意。

在此不逐一詳述元簡的著書，蓋由《傷寒論輯義》所見的特色，亦可見於元簡的其他論著。由其學問的特色，正可確鑿地證明元簡的學問即是考證學的學問，或謂元簡的《素問識》參採了稻葉通達、目黑道琢的著述^{①⑥}；雖然如此，卻未足以成為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相對地，以元簡為中心的「多紀學士」（譯者案：原文之意為以元簡為中心之周遭）促使考證學風開花結果的情形，畢竟是趣味盎然而值得深入探究。錦城即為「多紀學士」的一人。

多紀家的躋壽館藏書甚富，元堅謂：「其藏書自古今醫書至經、史、子、集藏蓄之，借覽生徒。」^{①⑦}今傳多紀元堅所編多紀家藏書的《聿修堂書目》雖僅分類編次醫書而已，實則明、清著作的收藏也極多。此固為多紀家及其周遭學者生徒學問研究的寶庫。雖無四部分類的漢籍目錄不免有些許的缺憾，然則其藏書蓋有與此相當的質量。因為醫書與儒家經典的研究是多紀家教育的宗旨所在。至於除了醫書以外，清人著作亦大量購入而廣為閱讀的事實，由以下的記錄可以明晰。品評《九經談》的豬飼敬所的書簡中，記載其旅次五條森田文作家時，遇見醫師小林道隆，小林與江戶多紀氏有深交，好博覽。閒談中，小林說：「清朝諸儒之文集舶來，通讀完竟，故屢來森田家。」^{①⑧}豬飼的書簡雖未記明、清人文集為多紀家所收藏，但是從文理脈絡看來，小林所通覽的清人著作，無疑大抵是多紀家所有。多紀家是當時蒐輯清儒論著的中心所在，亦由此可以窺察而知。事實上，水戶小宮山昌秀《楓軒紀談》卷二即記載著：「錦城為多紀氏賓客時，常借閱其藏書。」就錦城考證學知識汲取的泉源而言，多紀家的存在是有其關鍵性的地位的。

錦城二十歲至江戶，其如何結識多紀元德、元簡父子，進而得其賞識的原委，已不得而知。雖然，根據《春草堂集》的記載，錦城於天明六年，二十二歲時開始出入多紀家，不久即有密切的關係^{①⑨}。錦城吟詠不少詩詞而贈與元簡，其中特別值

^{①⑥} 石田秀實：〈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喜多村直寬《黃帝內經素問講義》をめぐる〉，《文化》45卷1、2號，對喜多村氏的研究極為推崇，於多紀氏及其周遭的學者亦敘述及之。石田氏以為元簡有掠奪前人之美的嫌疑。

^{①⑦} 見多紀元堅所著《時還讀我書》。

^{①⑧} 《豬飼敬所先生書東集》（《日本儒林叢書》第3卷書簡部所收），卷2（霜月十八日）。

^{①⑨} 據錦城於二十四歲寄與其兄之信（《春草堂集》，卷5，〈報伯恒書〉）所載，寄食於多紀家二年。又二十二歲時所撰詩詞，亦有與多紀家過往甚密者（《春草堂集》，卷3）。

得關注的是《春草堂集》卷三所收的〈宋版晉書歌贈劉桂山〉一詩。內容是敘述六經諸子的興起，歷代書目的豐富，進而強調宋版的珍貴，並具體比較宋代以後《晉書》版本的優劣得失。年甫二十二歲弱冠的錦城的學識發揮無遺，然而更重要的是《宋版晉書》即為元簡所珍藏。錦城說：「吾友劉君字廉夫，敏洽該博天下無。三世能傳岐黃業，業餘波及好吾儒。生平常抱奇書癖，異本怪冊甘於醪。家藏《晉書》宋刻本，愛玩不啻掌中珠。夜宴沈沈聿修堂，酒後為余開書篋。余生遐陬寒陋地，未見上國書庫藏。奇籍般般眼似眩，嗟嘆咄喝喜且狂。就中晉史天下寶，鉅冊從來倍尋常。……」

多紀家不僅購入清人的新著，也收藏有宋版之貴重版本。而且並非視之為骨董而把玩，乃以之為精善版刻，可為校勘之底本。由於版本校勘，篇章考證的關心而珍視宋版，是難能可貴的。晚宴之後，錦城首次目睹書庫珍藏書籍而欣喜若狂的光景，則富有深義而耐人尋味。此後，錦城或幾度睹見多紀家的罕見珍本，借閱清儒的論著。

據井上善雄的敘述，其自大聖寺耳聞山之西出義門氏借閱繕寫的錦城與兄伯恒書信中，所讀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毛奇齡《西河集》、徐乾學《澹園集》，「皆毛利侯之書」。尤以《西河集》百二十冊，「天下僅皆川文藏一部，今毛利侯自長崎取得，小子亦得見焉」（《大田錦城傳考》上，頁221）。又據錦城所撰《尚書古今文同異考》的記載，由於多紀氏的引介，乃得以借閱佐伯侯所藏的《澹園集》，則與井氏善雄引述錦城與兄伯恒書相合。再者，前文所述，錦城與皆川淇園書（《春草堂集》，卷三）中，提及未讀《毛西河集》，將自一藏書家借閱而讀之，即指自毛利侯借閱一事。據井上善雄《大田錦城傳考》的敘述，毛利侯者豐後（今大分）佐伯藩主高標侯，以設置佐伯文庫而有名。錦城於寬政二年，多紀家聿修堂的宴會中，會見佐伯侯，吟詩讚頌其藏書之富而奉呈之（《春草堂集》，卷七）。錦城經由多紀元簡的推介而得以利用佐伯藏書之事，蓋無可疑。

錦城與多紀家的交往，自然涉及學問的切磋。多紀元簡（櫟蔭拙者）的《醫臚》三卷與大田錦城《九經談》是清人欲得的考證性著書。《醫臚》頗引述錦城之說，卷中〈消息〉一項即是其一例。《傷寒論》所見「消息」一詞，多紀元簡解之為「損益多少之意」，並引《公羊傳·昭公十九年》的傳文、何休注及錦城之說而謂「此說得之」。由多紀元簡所謂「錦城……嘗謂云」，或錦城曾直接向多紀元簡敘述此意。《春草堂集》收載「代劉桂山（元簡）」的序文，如卷十二〈翻刻毛詩名物圖說序〉，卷十四〈婦人方彙序〉即是。二序為錦城四十四歲、四十五歲之

作。前者強調以博物多識之學無益身心家國之說為誤，假物象以寫義理之詩學，其名物考證尤為重要。由此《毛詩名物圖說》的翻刻，蓋可理解元簡與錦城的學問崇尚²⁰。

元簡之子元胤、元堅則為錦城的門下，師弟關係，交遊乃更為密切。元胤有文集《柳泂文稿》，元堅則有隨筆《時還讀我書》，載記「錦城先生」者隨處可見。《柳泂文稿》卷上，有〈崔氏食經序〉一文，卷末附載〈迂巢雜存〉的記事，亦有相關的敘述，即元胤本以崔禹錫《食經》乃後人所偽作，蓋以日本古鈔本所引佚文中，「菌」作「茸」，「芥」作「辛菜」（即苦菜），「萍蓬」作「骨蓬」，與《本草》所記不同，乃從《本草》學家小野蘭山之說，以崔氏《食經》為偽。其後查證於錦城先生，先生並不贊成，以《食經》所記或為六朝時所行之詞，如「篋」、「嵐」、「帳（簿）」本行於六朝，而今則以之為日本之訓詁亦然。元胤乃以錦城之說為「此又一說也」。唯至草成〈崔氏食經序〉時，則不採偽作說而從錦城之說。可知元胤頗信服錦城的學殖。海保漁村為錦城的高足，其之所以不從遊當時最有名望之古賀精里，而入於錦城門下者，即元胤所規勸的。元胤謂：「以余所見，則獨有大田錦城而已矣。」（《漁村海保府君年譜·文政四年》）元胤早逝，其《醫籍考》的編纂，以祖述朱彝尊《經義考》的規制而有名。

元堅《時還讀我書》記述大田錦城之事者，亦列舉其中之一於下。唐顏師古《匡繆正俗》有「斃者仆也。音與弊同。……今關中之俗，於斃之音，無讀弊者」。據此則《傷寒論》之「振振欲擗地」之「擗」即通於「斃」，以之質於錦先生，先生稱是，並舉〈堯典〉「在」通於「察」、〈祭法〉之「厲山氏」通於〈魯語〉之「烈山氏」……諸多例證示余。又以「擗」字部首雖有手足之異而通用否，請示先生，先生又舉《詩經》、唐人詩文、明《七修類稿》相通之例見示。「感先生之賅博，猶有餘也」。此皆宜列舉於拙著（元堅）《傷寒論述義》，然以醫書考證，非施治之要點，則一二確證足矣。「擗地=斃於地」者省略不載。唯先生之教，切實可考，故書之於茲備考也。「擗地」一語又見於《搜神記》。就此一條的簡要敘述，不但元堅（菑庭）的學問宗尚可以窺知，錦城學問應用於醫書考證訓詁之事亦

²⁰ 多紀元堅所著《時還讀我書》中提到「近日醫家著述，假名儒之手者多」（頁255），而舉成於春臺、淇園、栗山之手者，亦兼及龜田鵬齋、錦城先生。然則錦城與元簡的關係不僅是文章的潤飾而已。

確鑿可考。

錦城與多紀家三代交遊而可詳述者尚有甚多，茲止於此。錦城與多紀家三代的交往極為密切，尤以考證學的切磋為其中心所在的情形，由以上的敘述可以理解。至於錦城自多紀家所獲得的恩惠，是青年困窘時，蒙受知遇庇護，並且汲取新的學問資訊。雖然，其學問的源泉並不只是多紀家的藏書而已，如井上善雄所說的佐伯文庫的借閱，薈集於多紀家的碩儒名流的往來，都是成就錦城學問的重要關鍵所在。以下的敘述，仍然不脫離考證學的範疇，唯重點則移至「多紀學士」及當時學界大勢的問題上。

根據海保漁村《春草堂集》跋文的敘述，錦城的交友中，首先提到的是山中恕之、小川誠甫。此二人是在山本北山門下時結識的，二人皆早夭而死。誠甫志於諸子的解讀而於十七歲早逝，恕之志在詩文而享年三十二歲。誠甫死後三十餘年，由於其父的請託，錦城撰述遺稿《經子考證》的序文（《春草堂集》，卷二十）。此在文化十三年，錦城五十三歲之時。夭折的誠甫或為錦城少時學問切磋砥礪的良友，至於考證性學問的相輔相成，則未必有之。繼此二人之後，輔翼錦城考證學問之形成的最重要師友是吉田篁墩。吉田篁墩與龜田鵬齋、醫官山田圖南，都是錦城透過多紀家的引介而知交的。

吉田篁墩(1745-1798)，名漢官，字學生，江戶人，為江戶藩侍醫，因故遭流放，乃暫時改名易姓而為儒者。吉田篁墩本學於井上金峨，為儒者後，重漢學而治考證之學。從醫時，好以所得之資蒐集奇冊珍卷，故為鑒賞家。又喜以所蒐集之古版古文進行古書異同的考辨，故長於校勘，《論語集解考異》即其代表之著作。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以篁墩為考據學的創始者，說：「近時清人考據之說盛行，人知爭搜索元、明以上古鈔影本，實自篁墩始。」^②其學問內容，則「篁墩好合古鈔數本，比對校勘經史之異同，聞人儲藏珍卷奇冊，則百方求之，手自寫抄。其所校定諸書，皆極精核也。今按篁墩所為，與近世清人盧見曾、畢沅、孫星衍、段玉裁、戴震、阮元等諸家所言暗合者多。蓋考證精核，雖氣運使然者，先鞭之見在諸家之前，隔地而相同，真可謂卓絕也」。盛讚其見識先於清儒。

篁墩《論語集解考異》一書，乃校定何晏《論語集解》而成的。以足利學校所

^② 東條琴臺撰吉田篁墩《近聞偶筆》的跋（文政九年），亦以篁墩之學為「首倡考據學於安永、天明之間」。

藏慶長版，即要法寺本為底本，參採七種古本為校勘，又比對開成石經、皇侃《義疏》（舊鈔本）、陸德明《釋文》（通志堂本）、宋邢昺《正義》（明國子監本）、朱熹《集註》而明其異同。所謂七種古本，是指卷子古鈔本（又稱貞和本，或菅氏本）、舊版大字本（正平版）、大永鈔本、永祿鈔本、清原宣賢本（天文版）、國訓本、伊氏本（享保中伊藤東涯序本）。其中菅氏本出自大和農家，篁墩所特別彰顯的，大永鈔本是京都藏書家藤井貞幹的珍藏（其後移至狩谷掖齋的求古樓），足見篁墩博搜旁求之功。

我國（日本）的校勘學先於中國，發其端的是享保十六年（1731）山井鼎撰，荻生觀補的官刻《七經孟子考文》。由於荻生徂徠的指示，山井鼎和根本遜志二人往赴足利學校，依據足利學校所藏的宋版、古鈔、古本的珍籍，校勘《五經》、《論語》、《孝經》、《孟子》八書而成《七經孟子考文》。此書刊行不久，即渡航中國而收入乾隆初年開設的四庫全書館，影響中國學界甚大。由於此一契機，我國（日本）的學界廣泛地認識到舊鈔古本的珍貴，網羅古籍殘卷以為誇耀的風潮乃應運而生。京都的藤井貞幹是與大阪的木村巽齋菴葭堂並稱的關西藏書家代表。篁墩的好古嗜好，亦是此一風潮下的產物。就《論語》而言，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記載有「古本《論語》二通、足利本《論語》、皇侃義疏《論語》」，如此便使中國學者驚歎不已。然則篁墩仍以爲不備而四處訪求，期於完備^②。故安井小太郎盛讚《論語集解考異》甚爲精到，除承續上引東條琴臺之說外，並比對當時清儒的研究，說：「清朝校勘之學，以盧文弨、顧廣圻、阮元爲大家。文弨之卒在乾隆六十年（寬政七年，1795），則與篁墩同時。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成於嘉慶十年（文化二年，1805），則後於《集解考異》十五年、後於《七經孟子考文》七十餘年也，故校勘之學，我實唱之，彼似聽風而興者也。」^③

安井所言不但精確而且是值得強調的所在。然則篁墩《論語集解考異》尚有需要探究的地方，即篁墩不是校勘《論語》，而是校勘《論語集解》的。根據此書卷首〈提要〉的敘述，篁墩頗具有獨特的見識。篁墩特意不涉及魏何晏《集解》以前的

^② 皇侃《論語義疏》失傳於中國，徂徠門下根本遜志校刻而傳入中國。又正平版《論語》則由朝鮮傳入中國，錢曾《讀書敏求記》以高麗本爲善本而頗推重。

^③ 安井小太郎：〈論語集解考異解題〉（《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論語部參》所收，1922年）。

《論語》版本，是因為兩漢的《論語》是齊、魯、古三論並行，古典的引用亦雜然並存，難以區別。如〈八佾篇〉的「哀公問社」的「社」，何晏以前的別本作「主」，如此則意義完全不同。合併而校勘是不可能的。再者，篁墩又說「經本傳授之異」，如〈學而篇〉的「貧而樂道」的「道」，古本有之，而宋邢昺本則無。《史記》、《後漢書》的引用，皆有之，如此則或為邢本之誤。然而《集解》所引的鄭玄注本亦無「道」，故未必是邢本之誤；或所本有異，非探究其版本原委不可。

由此可知，篁墩的校勘是極其審慎的。其不僅是蒐羅眾多的珍本而已，更進而考察其版本的系統原委。故其主張版本的校勘，宜依據版本的系統而究明其本源，不明其系統的究竟而考察原本，必有誤謬的。篁墩以為何晏的《論語集解》是今本《論語》的根源祖本，故進行校勘。在此以前的古代的版本形式，其系統難以樹立，故置之不論。篁墩的主張確實是校勘學上卓越的見識。十五年後，阮元的《校勘記》則未見篁墩的《考異》。其所蒐集的資本不但不完備，就篁墩的立論而言，僅止於邢昺疏本的校勘，則不免有粗漏不密之嫌。

篁墩拔卓的校勘學，其後為市野迷庵(1765-1825)、狩谷棧齋、岡本況齋所承續，大田錦城是吉田篁墩的至交好學，錦城頗尊敬篁墩的學識；但是對於篁墩執著於古書而僅以校勘為依歸的學問態度，則甚不以為然。此見於《春草堂集》卷七的〈報吉篁墩〉，即篁墩贈所著《論語集解考異》，錦城答謝的書信。時寬政三年，錦城二十七歲，篁墩四十七歲，錦城首先推崇篁墩身處輕薄的世俗中，節操高蹈而篤信漢、唐古學的學風。唯漢儒亦有缺失而後儒亦有得之處，以古為是而墨守《集解》舊說的態度是否為當，又古書未完全，則極有思索以探究聖人遺意的必要，僅止於《集解》的校勘，到底為切當否。錦城如此批評後，又以具體的事例指陳論述。其以《論語·八佾》所述周武音樂「未盡善」的注釋，何晏《集解》所引的孔安國注，解釋為有非難武王征伐之意。然據唐孔穎達之說，鄭玄注曰：「武王即位期間甚短，『未致太平』也。」則鄭玄注為是，此《集解》古注未盡完足之一例。關於此注，清顧炎武以《左傳》的記事而言，則與鄭玄注一致²⁴。即後人的思考與漢儒暗合，符會聖人旨意的一證。錦城所舉的例證尚有不少，茲省略不述。由此書

²⁴ 金谷治：〈鄭玄と論語〉，《唐鈔本鄭氏注論語集成》（東京：平凡社，1978年），頁401，詳述鄭玄注的問題。

信，不但可以窺知錦城博學多識之學殖，亦可理解其與篁墩學問宗旨殊異的所在。雖然如此，以校勘學爲學問而致力樹立校勘學的吉田篁墩，當然也未必接受錦城的批評。

錦城對於此事，於晚年述懷地說：「昔時亡友吉田篁墩只好校正，故有與亡友村田春海……笑之之事。其時予三十歲，今則垂白之老人矣。」（《梧窗漫筆後編》下）錦城於此文的開端說：「世之愚人雖不校讐而以爲誤字，非以妄意可改得於心者以外，昧古之過也。古人於誤字者，以意改之也。」即錦城以爲不依校正而以意改誤字者，亦大有必要。此與篁墩嚴密之科學性、客觀性的極致而樹立校勘學的學問宗旨，是大異其趣的。因此，東條琴臺以吉田篁墩開啓日本考據之先聲的論說，大抵無誤。唯錦城的考證學乃在超越篁墩校勘學的藩籬之外。

對於「中庸」的解釋，錦城或與篁墩有極大的分歧。在多紀元簡之前，二人的解釋不同，錦城解之爲「中者，無過不及之德；庸者，常經不易之德」，篁墩則頗不以爲然，甚且批評之爲「異端邪說之流」²⁵。錦城極爲憤慨，不但列舉爲數不少的古典事例以證明己說爲是，也寫信與友人以抒發其鬱憤之情（《春草堂集》，卷五，〈與龜田公龍書〉）。二人學問宗旨的不同，由此亦可察知，而且錦城亦有所自覺。雖然如此，錦城於學問上蒙受吉田篁墩極大的啓發與砥礪，亦不辯自明的。

錦城於二十二歲吟詠有〈篁墩先生歌〉一詩（《春草堂集》，卷三）。敘述篁墩日常閒靜的生活，於己既是詩文之友，亦有兄弟之交。「相見相恨相知晚，提挈相呼弟又兄……海內知己唯吾輩」。此詩於二人相知不久時所作而贈與篁墩的。此後二人交遊十二年，至篁墩死，知交不逾。據篁墩《近聞寓筆》的記載：篁墩論述清康熙、乾隆二帝之德與在位時間極長的關係，錦城引《書經·無逸》，說殷中宗、高宗亦同。因此篁墩盛讚錦城於經學的精通。自錦城借讀安積澹泊的《烈祖成績》亦敘述及之（皆見於卷一，《日本儒林叢書》續篇一，頁9）。

當然，錦城亦有受教於篁墩的所在。錦城的〈新刊西域聞見錄序〉（《春草堂集》，卷十）說：「亡友篁墩吉學生曾謂予曰：近世清人著述概多好書，然其中辯證博洽，莫《逸周書注》若也。稽古探頤，莫《古經解鈎沈》若也。記載爾雅，莫《西域聞見錄》若也。予時唯唯不應。」其後詳加考證，前二書未必若是，而《西

²⁵ 據《先哲叢談續編》所載，篁墩「以校勘精密爲主，不好辯駁」。錦城如此形容，或出自於其嚴峻之性格的緣故。

城聞見錄》則果如篁墩所言。由此文蓋可知二人切磋學問之一斑。篁墩於清儒著述中，推重此三書的記載，亦見於所作《近聞寓筆》卷四。再者，〈周易重言重意後序〉（《春草堂集》，卷九）亦有錦城直接受教於篁墩的記述。有關「重言重意」的珍本，篁墩指陳《詩經》亦載記有之。錦城乃推崇篁墩「其學之博，真可稱奇」。又學於錦城的屋代弘賢（1758-1841）之子，持其父所藏之慶長版《周易》古注本示諸錦城，錦城爲之解題，而讚賞屋代弘賢「廣搜遍索，其藏之富亦可稱奇」。屋代弘賢與吉田篁墩的交誼甚深，錦城自二人而獲得不少知識，亦可想見。

錦城的友人中，尚值得一提的是近藤正齋（1771-1829）。近藤正齋是經營蝦夷（北海道）之地後，任御書物奉行，埋首於書籍研究，著述《正齋書籍考》、《右文故事》傳世的人物。其與錦城的交遊，是文政二年調任大阪之前的十年間。文化八年夏，錦城應邀泛舟墨田川以消暑，在船上閱讀正齋所藏的《揚州畫舫錄》。錦城時年四十八，學問大抵圓熟，故能論考有關書籍的學問（《春草堂集》，卷十五，〈題揚州畫舫錄後〉）。正齋好以珍藏書冊示人，以議論書誌之學的情形，除錦城的記述以外，又見於多紀元胤《柳洲文稿》卷上。多紀元胤造訪近藤正齋，正齋示之以米澤侯所藏的宋板《史記》，元胤乃錦城的門下弟子。

近藤正齋的目錄學之師是狩谷掖齋（1775-1835），掖齋小錦城十歲，掖齋的學問出自松崎慊堂（1771-1844），拔擢慊堂的是林述齋（1768-1841）。林述齋雖爲幕府大學頭，是當時朱子學的代表人物，卻以編纂中國既已亡佚而僅存於日本的《佚存叢書》六帙而有名，慊堂的漢學即以《佚存叢書》的編纂而圓熟具成。醫學考證學者喜多村直覺（香城）的《五月雨草紙》以掖齋、慊堂二人爲日本清朝考證學的創始者，醫家多紀菑庭（元堅）、小島學古（尙質）受其影響而創立醫學考古學。此與東條琴臺以吉田篁墩開啓考證端緒之說雖然有所不同，時期大抵相近，蓋值得留意，尤其是以掖齋爲中心的考證一派的學術活動極其活絡，爲當時的顯學。掖齋之學與錦城迥異的所在，是掖齋的學問了無錦城折衷漢、宋的強烈色彩。即以掖齋爲中心的一派學者，乃以漢、唐注疏之學爲極致，純然具備近似清朝考證學的學風。多紀元堅之與掖齋等人的密切交往，由其所著《時還讀我書》亦可知其梗概。元堅固然尊敬錦城爲其啓蒙受業之師，對掖齋，尤其是掖齋的《說文》學，尊崇更深。

錦城或未與掖齋等人有直接的往來，蓋錦城對單純的目錄學或純粹的校勘學是採取批判的立場，錦城會積極地與彼交遊是甚難想像的。尤其是掖齋和篁墩都是當

時流行的書畫會的中心人物，也是鑑賞的名家，然而錦城對此風潮極為嫌惡^{②⑥}。雖然如此，錦城自篁墩、屋代氏、近藤正齋處，或由於出入多紀家，獲得目錄版本學的新知，是不容否認的。

國學者村田春海(1746-1811)的事蹟亦稍作敘述，其死後，門人高田(小山田)與清請託錦城為其遺稿撰寫序文。據錦城的序文所記，錦城與年長二十歲的村田春海是忘年之交，「相會則講論經史，商量詩文，時及治道之得失，人物之臧否」，春海之師為賀茂真淵，儒學之師則是京都的皆川淇園。其承續真淵的學風，既研究古語，亦探究本朝實錄典故，以考證性研究見長。據其《織錦舍隨筆》的記載，春海極陳世間各於見示書冊之失，主張書冊宜公諸於世，進而載記興福寺和仁和寺的秘藏珍本^{②⑦}。受命鈔寫仁和寺古書，即《醫心方》，則兼及多紀家之名。其謂古書「非私有」，宜廣為流傳的見識，頗值得稱揚，而此亦正反映出考證學家夙願。上文所述，錦城見宋版《晉書》，多紀元胤見宋版《史記》而欣喜若狂，其實春海亦其中的一人^{②⑧}。又春海以通本朝典為和學者之重任，然則其反對本居宣長者流提倡特別的古道，其以為所謂道，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②⑨}。其與錦城交遊的詳細原委雖不可查考，但是喜論道的性格，則與錦城意氣相投。錦城《梧窗漫筆》所見和學的記述，或得之於春海者，亦未可知。

請求錦城為師之遺稿撰序的高田與清是學漢學於古注學者古屋昔陽的國學考證學者，又以藏書家而有名。其與錦城的友人大田南畝主持《曾我物語》的讀書會，蒐集「建部氏古寫本、活版本、寬文五年刊本、(岸本)由豆流家之古寫本、吾家藏寬永四年刊本、他一古寫本」，校勘其異同，而論斷「由豆流本之良善」者多(《擁書漫筆》，卷二)。由豆流者，文庫三萬卷之藏書家。高田與清亦長於名物考證而與其師春海同。其引述及於清邵晉涵《爾雅正義》(《擁書漫筆》，卷二)，可知其積極汲取清朝考證學之研究成果的學問取向。《爾雅正義》刊行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翌年重修，於寬政十年(1798)傳入日本，與清於文化初年執筆《擁書漫筆》，蓋《爾雅正義》傳入以後的十年左右之事。

②⑥ 《春草堂集》，卷21，〈與大窪天民論名士品題書〉此書詳述於後。

②⑦ 村田春海：《織錦舍隨筆》二卷(《日本隨筆大成》1期3卷所收)的卷上。

②⑧ 林述齋《佚存叢書》的刊行始於寬政十一年(1799)，助長古書鈔寫、模刻的機運。

②⑨ 內藤虎次郎：《近世文學史論》(東京：昭元社，1939年)。國學考證學亦宜詳考，今無餘裕。

在錦城的師友，最後非敘述不可的是錦城早年一時之師的山本北山(1752-1812)，錦城遊學江戶，最初入於山本北山的門下，由於嫌棄山本北山的人品及學識皆極為低劣，僅一年就退出師門，唯最初錦城對「一高名之人」的山本北山頗加非議；數年之後，則對山本北山仍執業師之禮。北山逝世之時，錦城年四十九，作北山先生輓歌，稱北山為文壇之雄，而「狂瀾溢于四海」。

山本北山，名信有，號孝經樓主人、奚疑翁，江戶人，為井上金峨門下，與吉田篁墩、龜田鵬齋同門。金峨與多紀交往甚密，尤與元簡之父元德交誼更深。其學風由所著《經義折衷》的書名即可知道是折衷學。北山雖奉折衷學，而學風則傾向考證學，如其號「孝經樓」，可知其學問乃以《孝經》的研究為中心。茲論述於後。

眾所周知的，《孝經》在中國原本只有唐玄宗御注的今文版本行於世，朱子《孝經刊誤》出，始疑《孝經》本文為偽作。但是日本則有漢孔安國傳的古文傳世，荻生徂徠的門人太宰春臺於享保十六年(1731)校刻刊行而傳入中國，又唐魏徵《群書治要》所引鄭玄注本，亦僅傳於日本，寬政三年(1791)尾張河村益根採集而成《鄭注孝經》，付梓刊行。三年後，岡田挺之修補出版，其後傳入中國。此與孔安國本並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中，玄宗御注之開元初注本，在日本亦有古寫本，寬政十二年(1800)屋代弘賢模刻出版^⑩。山本北山的《孝經》研究，即以此動向為背景而進行的。

北山的《孝經集覽》刊行於安永四年(1775)。附載太宰春臺的〈古文孝經序〉，足見其對《古文孝經》有強烈的關心。唯《群書治要》的《鄭注孝經》則未收載。為便於閱讀，北山並舉今文玄宗御注、邢昺疏、古文《孝經》孔氏傳與朱子《刊誤》，然後加以自注，蓋只是折衷諸說而未至於考證。但是寬政九年(1797)出刊的《校定孝經》、《經義擷說》則大異其趣。校定本乃如書名，以校定《孝經》的本文。其謂：「今文則唐御注、鄭注本、漢直解本、邢昺正義本、元行沖注疏本。古文則宋本、司馬光指解本、朱申注本、孔傳足利本、元祿本、享保本、清原本。其他朱熹《刊誤》，(元)董鼎本、吳澂本；(清)任兆麟本、江元祚彙注本、姜兆錫本義本；(日本)道春本、闇齋本、益軒本、了海本、純卿本、兼山本等盡校合，有一字之異則皆明之。」至於其他古典、《經典釋文》、《七經孟子考

^⑩ 參考武內義雄：〈孝經の研究〉，《武內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78年)第2卷所收。

文》、《群書治要》與《孝經》本文有關者，皆校勘及之。又「每聞有藏《孝經》異本者，則躬往較之」。北山的校勘，是以今文爲底本，只有古文的文字則以陰文行之，朱子《刊誤》所疑的語句則施以方形勾勒而出，然後加諸校定識語，使各本的異同一目瞭然。網羅群書而不作取捨的論斷，畢竟是折衷一派的學問。務於博蒐而不免有遺珠之嫌，然而北山所爲，大抵是取得《孝經》善本，以進行考證性學問的基礎工夫。

《經義揅說》旨在究明《孝經》的諸問題。北山以爲「漢之今文非今之今文」，「今之古文非漢代之古文」，孔安國傳和鄭玄注雖爲僞作，本文則傳孔子、曾子的聖訓，宜尊重之。又以「今傳《刊誤》非朱子原本」，而進行考證。歷來研究的引述中，朱彝尊以下清人之名頗多，至於《知不足齋叢書》亦有言及之，可見北山對清人學問極爲關注。雖然如此，其所進行的考證卻未必精確。如對朱子《刊誤》的批評，是主觀地以爲懷疑《孝經》是誤謬的，故儘其迴護地列舉與本身立論相同的例證，缺乏客觀性與可信性。此未盡圓熟之考證性論述，於《古文尚書勤王師》更爲明顯。此書旨在證明與錦城相反主張之《古文尚書》爲真的問題。其引述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而批駁清儒的僞作說，其列舉閻若璩的《疏證》以迄江聲《集注音疏》、王鳴盛《後案》而一一駁斥，此固可以顯示出其學問之廣博，但是見識與考證則未出毛奇齡的境域。此書於北山死後十二年的文政七年(1824)出版，是其子信謹遵從其遺囑而刊行的。由於未經審慎的校定，門人之間對出版一事亦有持反對者。而且錦城的《九經談》既已刊行二十年，學界大抵以《古文尚書》爲僞作者居多。故《古文尚書勤王師》固可以表現出北山的博學，但是其見識闕如的一面亦暴露無遺。

北山的學問論述至此爲止，其繼承金峨的折衷學而加諸考證性學問的取向，由此述蓋可窺知，其與同門的篁墩、鵬齋並列，而學風則少有變易，年少而老成的錦城亦躋身其列。就當時的學界而言，如上文所述，有以多紀元簡爲中心的「多紀學士」，亦有以松崎謙堂、狩谷掖齋爲中心的漢、唐注疏學派，亦有國學家而兼及考證學問之村田春海等人，一時俊秀輩出其間，終形成考證學派成立的時代。

錦城的周遭而必須探究的問題尙有甚多。交遊的朋友，除了詩友之外，太田南畝、藤田幽谷即值得研究，幽谷是撰述錦城「墓表」的人物。《春草堂集》卷九所收錦城的〈送序〉，雖是綜論天下的文章而與考證無關，但是幽谷所著《孝經孔傳辨》、〈舜典二十八字考〉則是考證性的論著，其與錦城交往而受錦城影響，自然

不少，唯篇幅所限，茲不贅述。茲就考證學派成立的時代狀況，探討其學術性格及其歷史意義。

三、「學」的分裂

大田錦城是考證學者，但是如上文所述，其對於治學只停留在考證性的學問探究，是抱持著批判性的態度。其批評尊奉純粹性校勘學的吉田篁墩，而主張學問有思索的必要，此既已表現出大田錦城對考證學的內涵有著批判性的反省了，其以清人之漢學為「無用之學」，傾注十八年心血於《尚書後案》的王鳴盛是「愚惑至極」。此類批評既已脫出考證學的境域。雖然錦城到了晚年，對考證學的批評頗為強烈；其實在《九經談》中，亦有此類批評的敘述。錦城說：「近世清人考據之學行焉，人好獮祭。學問之博，過絕前古，然不論義理當否，而唯欲援據之多，……予名之曰書肆學焉。……義理，本也；考據，末也。考據之精，欲得義理之微也。……考據之學，其所費精，則在瑣義末理，而聖道大原，則措而不講，是亦近世學者之弊也。」（卷一）錦城雖然以「精密纖細，古今之所無」（卷一）乃是考證學之所長，但是「其學過精細，而無一人發大見識，以道自任者」（卷一）則是考證學者的缺點，亦即錦城學問的宗尚，在聖道，而發揮聖道的義理則是學問的主旨，至於考證學只是手段而已，由此可知錦城所以採取折衷漢、宋優點的學問立場之因由。

錦城以為「學者先須知漢、宋諸儒之所短，既知其所短，則知學之不盡于此」（卷一）。即錦城並未全面否定漢學或宋學。換句話說，如同認知漢學（訓詁學）所長而活用之，錦城亦以為宜認知宋學的優點而活用之。因此，錦城說：「六十年來，學者之誤，唯是功利之心。……非假宋學，則不能對治此病，予不信宋學，而喜人之為宋學，為此故也。」（卷一）即強調宋學有益於道德的修養與聖道的發揮。強調實踐性意義的《梧窗漫筆》，在這方面的傾向就更為強烈了。錦城以為學問固宜精密細微，但是只盡於章句的考證，則如同書庫，以無益於己而為「無用之學」，王陽明、羅汝芳之學單刀直入而為「有用之實學」，唯於章句文字的解釋則流於誣妄。朱晦庵、郝京山之學大抵訓解精當，且「有用于身心」，雖是如此，亦未必完全可信（《梧窗漫筆》正編下）。學醫者，讀《傷寒論》而學可致用，為有用之學；但是學儒者，讀《論語》、《孟子》而未必可以實用，故學用乖隔（《梧窗漫筆》，後編上）。今之學者專致於考證之精密解釋，而不顧自身之身心言行的

修養。雖然精於考證而不明天地之事者，與愚者無異。故不信奉聖人而以弘揚正道為志，則將陷溺於如荻生茂卿之徒似的恣意放縱。

大田錦城頗以發明義理，未怠於實學之闡揚自負。其自稱一改青年時期侮蔑宋學的觀念而宗尚實學者，乃得力於宋、明儒的著述，錦城說：「自身學問之異於世俗，但止於形式考究之學問者，蓋得助於袁了凡陰隲之說、宋儒論著之研讀。」（《梧窗漫筆》，正編下）「陰隲」者，陰德之稽也。明袁了凡《陰隲錄》雖是通俗勸善行德之書；由於具有實踐性意義而擁有廣泛的信奉者，錦城於晚年曾對門下講述此書而論說「實學」的重要。其於《九經談》中亦曾敘述「實學」之要。錦城說：「徂徠唱禮樂，稱宋學為空理，似矣。然禮樂殘闕，不可復行，則稱古禮樂似實學，而其實空論耳。講義理者似空疏，而其實可行今日，則真實學也。」（卷一）即以可以行之於今日之學為實學。至於「實學」的具體性質為何，於其批評考證學的論述中，大抵可以知其究竟。雖然如此，其於晚年，對「實學」的界定，則頗值得注意。錦城說：

（清人）所謂漢學者，無用之事也。……然益於道義者雖少，於經學不無功也。（《梧窗漫筆》，正編下）

錦城批評清人的考證雖無濟於世用，卻有功於經學的研究。由此論述中，可以察知錦城對「實學」的界定。即其頗尊重「實學」，且從「實學」的立場，涇渭分明地區別「道義」與「經學」之性質與意義的差異。以身心言行之道德性修養而濟用於世的「道義」，經典之字句考證的「經學」，二者判然分別，分屬不同領域的看法，猪飼敬所亦如此。

猪飼敬所（1761-1845），名彥博，其學風與大田錦城頗為相近，皆旁通清儒考證之學。其謂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戴震校本《水經注》與己說頗多暗合的所在（《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二、三）。對段玉裁《尚書撰異》考證之精密，則極其感服（《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三）。雖然如此，其對考證學亦有不少批評，如「孫星衍……考證之學於經義無發明，於實學無益」（《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三）。「今時清儒新說疏漏多，縱使可取事有之，瑣末之考證，雖不知亦可也」（《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二）。猪飼之所以批評考證之學，乃其頗推崇「實學」。猪飼說：「愚意先王孔子之道，重人倫，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用而已矣。」（《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一）故以「治心身之實學」為可貴。其少年時「學手島氏之心學，……常論治心身之工夫」。故與現今學者不同，虛

心而少名利之心，讀書亦常內省其行爲（《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一）。

當時有人來信說，世間講有用之實學者少，就自己的身分而言，學問的必要性亦少，就此不做學問的研究。猪飼敬所回信說，有此質疑便是「實學」，以家傳事業為主，亦可涵泳學問的樂趣，如此便可「世事、學問兩可得矣」。此人又來信說，現今米價高漲，民生疾苦，而以讀書聞道無濟於事爲困惑，猪飼敬所回函說：「足下之問誠實學也。……世人多書籍上之事而已，而不及事業。此事業，不由道理而任己以行，以學問爲學問，事業爲事業而得於心云云。」猪飼敬所的書簡未必能消解其煩惱，然而此可知錦城與敬所的學問觀大抵相近。敬所於此信函中又指出：「學問者學問，行事者行事，行事者只顧利害而外義理，是古今之通病也。」敬所則以自身兼顧學問與義理而自負。雖然如此，當時的現勢則是學問與義理分裂爲二。敬所感嘆著說：「今日京師儒者皆風流之徒。儒風不揚，實可浩歎。」（《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七）至於江戶考證學，亦爲瑣末之流，敬所批評之曰：「松崎氏（慊堂）以珍重殘本之石經爲事，學者尚新奇，於經義無補也。」（《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卷五）

錦城與敬所所謂的「實學」，是繼承孔子所傳承的實踐性，有用於現實的學問。此可以說是儒學的正統。唯其所精通的考證學的新學問，到底造成何種局勢？大抵當時儒學的研究廣博而且精密，但是儒學精髓所在的實踐性卻極爲稀薄，亦即踐履學完全被忽視了。錦城與敬所之所以名踐履之學爲「實學」，且全力維護匡救其衰微的原因即在此。由二人的主張，蓋可窺知考證學所造成「學」的分裂現象。

就日本儒學的發展而言，傳統儒學概念的崩頹，道德修養的輕忽，實肇始於荻生徂徠。不過，徂徠雖不重視內在的道德修養，自身的素行亦極放縱；但是徂徠是以儒學爲政治之學，主張儒學的實踐性功能的。恣意放縱而言行無類，以至於失去儒者節度分際的，是徂徠的門下弟子。就此意義而言，徂徠所開展出來的學問，造成了學問分裂的結果，播植學術分裂種子的，畢竟還是徂徠。門下弟子中，不僅有以太宰春臺、服部南郭爲代表，主張經學與詩文分立者；「譯社」之唐話學，促使俗文學研究之開啓；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根本遜志《論語義疏》的校刻，亦開拓了考證學研究的道路。此研究領域的拓展，特別是詩文的流行，自然地超越儒學的範疇，而與國學家、醫者及其他學者有熱絡的交流。此種情勢自然也使踐履之學不受重視的現象更爲顯著。

由於研究的領域廣拓，受業者與傳授者形成分化的現象也是自然的趨勢。伊藤

東涯(1660-1736)有〈師說〉^①一文，指出：「師者，其品亦不同」，而分傳業之師爲句讀之師、說書之師、修辭之師、踐履之師四類。此四類之師「固不能相離，亦不能偏合」，故不得不有所偏向。東涯如此論述，固然與其繼承家學，以學問研究終其一生的學問立場不無關連；徂徠死後之享保末年的江戶時勢，亦非了無關係。與大田錦城同時期之朱子學者岡田寒泉，分後世學問爲儒者之學、訓詁記誦之學、詞華文辭之學，以儒者之學爲「踐行之於己而志於聖賢之域」的實踐倫理之學（《幼學指要》）。此但以東涯所謂「踐履之師」才是儒者之學，則蘊涵有儒學純化的意味。與東涯所處的時代相比，訓詁記誦——即有關考證的學風，詞華文辭——即詩文的創作，飛躍發展的現實情況，可由岡田寒泉的敘述中推察而知。寒泉以朱子學正統之傳統學問觀爲底據，主張記誦、詞華之學爲雜學，宜排除於儒學之外。事實上，踐履之學的失墜現象，首先由於詩文的流行而產生，其後，又由於考證學的風行而劇增。錦城與敬所固然肯定考證性研究的學問有其價值，是儒學的一端；但是因此而形成儒學踐履之學的不振，則宜有所驚警，故對考證學進行批評，而提倡「實學」。

大田錦城認爲當時流行的考證學的現象有頗爲不堪之處。錦城說清人考證學傳來，形成凡百學者樂爲考證的現象，學問固然有考證的必要，但是現今則考證學下及北野屋（佐原）、鞠塢、山東京傳（《梧窗漫筆拾遺》）^②。據高田與清所敘：京傳（磐瀨醒）的考證「不似世之未成器著述家之類，其著《骨董集》雖無一處徵引典據，亦可想見」（《擁書漫筆》，卷三）而稱譽有加。但是錦城以爲，考證之學而及於庶民出身之戲作風情，淪爲遊戲三昧所利用，則極其不堪。事實上，考證學爲文化、文政時期的流行現象，好事者有初春考證一事，板刻饋贈的流風習俗，屋代弘賢於文政七、八年間亦曾倣倣爲之^③。此大抵爲附庸風雅的遊戲之舉。

錦城對當時盛行於書畫會亦有所抨擊。錦城以爲此徒爲書畫篆刻之士沽名釣譽所利用，非君子之所宜爲者（《春草堂集》，卷二十一，〈與大窪天民論名士品題書〉）。此書畫會與考證學無關，但是類似此會的種種展示會，可以目睹珍奇的物

① 伊藤東涯《經史論苑》所收。享保十九年（1734）撰。

② 中山久四郎〈考證學概說〉謂錦城或指鞠塢〈萬葉集草木考〉、〈春秋七草考〉、〈都鳥考〉，京傳〈浮世繪原始〉、〈近世奇迹考〉、〈雜劇考〉而言。

③ 中山久四郎著〈考證學概說〉，頁25，其後則敘述考證學流行的大勢。

品與書籍，故當時頗為流行^{③④}。吉田篁墩、狩谷掖齋支持此類展示會，成為書畫鑑賞名家，既已敘述於前。經常與篁墩往來的有松澤老泉之人，乃是經營和泉屋之書商，其後有關於書籍考證之著書刊行；至於博覽的藏書家屋代弘賢亦常出入篁墩、掖齋之家，狩谷掖齋的展示會尤盛於當時。除書畫會之外，尚有古書展示會、讀書會，其《說文》會尤聞於世。篁墩與掖齋皆為考證學的代表人物，唯其主持的展示會與著作，畢竟了無錦城所期望之聖人大道的見識。就錦城看來，此二人不免「無益于實學」而終其一生。

狩谷掖齋的〈墓碑銘〉^{③⑤}記載著一段軼事。掖齋和友人市野迷庵談論經義，迷庵謂：「宜從事於宋儒經解，否則不適于實用。」掖齋於是精研宋學。不久，嫌惡宋儒之臆斷，體悟漢學之可信，乃說服迷庵捨宋學而就漢學。迷庵所謂的「實學」，其意義究竟是指宋學為踐履之學，抑或治宋學而得以為世所用，則不可察知。雖然如此，到底是意味著有用於現實之學。狩谷掖齋則不以為然，蓋以宋儒之學未必「真實」，因為「兩漢經學，最重師法，授受相傳，確有淵源」，唐代尚流傳其遺風，但是宋儒卻一掃其傳承，故嫌棄宋學。由此可知，掖齋以為「實用」與「真實」是一致，其書齋名之為「實事求是書屋」，可知其對「真實」的標榜，甚至於是「真實」先於現實的有用性。此或可謂之為脫離踐履之學的獨特的學問觀。掖齋以為唯有真實的探究才是考證學的精髓。就此意義而言，考證學之成立亦可見於吉田篁墩的學問。雖然如此，篁墩之師井上金峨(1732-1784)的學問依然屬於折衷學派，而未可謂之為考證學。

井上金峨的〈墓碑銘并序〉^{③⑥}說：「大抵取捨訓詁於漢註唐疏，折衷大義於朱、王、伊、物之問。而其所持論，闡發孔、周之道，匡前修之不逮者。」則金峨的學風蓋重漢、唐訓詁，綜輯古今諸說而已，未有考證學之博蒐而實證的取向。繙

^{③④} 澀江抽齋、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可視為考證學的成果。此書之撰述，乃起因於記錄文化十二年，狩谷掖齋、市野迷庵、伊澤蘭軒、多紀元堅、近藤正齋、小島寶素等人書籍展示會的情形。(川瀨一馬：〈經籍訪古志の成立〉，《神田博士記念書誌學論集》所收)又狩野掖齋(求古樓)珍藏眾多善本的事，由《經籍訪古志》的著錄即可窺知。其有益於考證學者之研究者，久保愛《荀子增注》即是一例。此書序文(文政三年)指出，由於掖齋借閱宋本，「雲霧始開，白日再明」，對掖齋極為感謝。

^{③⑤} 大川茂雄、南茂樹編：《國學者傳記集成》(東京：國本出版社，1934年)所引。

^{③⑥} 《日本名家四書注釋全書》學庸部、壹附載。

閱其《經義折衷》一書，則以取捨程、朱以迄伊、物的先儒前賢之說爲終始。至於其學問的宗尚，則在發揮先儒所追求的聖人實踐之道。其《經義緒言》說「聖人之教，在道與德」，並引述古典而強調道者禮也，德者孝也之義，進而申論「以曲禮立身，以經禮治國」之道。可知金峨的學問極致與考證學迥異。

井上金峨的學問中，尙有值得注意的是其對師道的闡述。根據其門人的敘述，金峨視門下弟子如友朋，而不以傳授之師自居。金峨感嘆「師益傲慢，則弟子益卑」，故當今學子皆「錮於師說」。金峨以爲「師者傳道」者也，「學問之道在自得」，不宜墨守師說（《師辨》³⁷）。此說雖不免激越，金峨日後亦有自責之意；但是此與其所思索之道，始終是一貫的。金峨不但以爲「道者禮也」，而且「安天下之道，豈儒家者流之私有耶」（〈經義折衷題辭〉³⁸）。由此可見，此道之開放性的解釋與自由師道之說是相應的。金峨此自由開放的思想，孕育了考證學流行之豐饒的土壤，是無可否認的。

井上金峨的道的思想乃是承繼徂徠「道者多端」（《辨道》）的思想而來的。金峨以爲宋儒以道爲私有，徂徠則反之，即道爲天下共有者。唯末流忘卻道的存在，故「不亦可悲乎」（〈經義折衷題辭〉）。天下共有且廣播流傳的道，不擴散而雲消霧散，以禮而嚴然長存，則是金峨的理想所在。但是現實卻不然，道之擴散而盪然無存的現實情況，由儒學之道的失墜可以證明。道非私有，是金峨所有闡述的重點所在，由此可以聯想及錦城、敬所強調實學時，盛稱陰陽、心學之功效的論述。由於道的擴充而儒學思想的自由伸展，卻也因此而造成儒學實踐性、實用性功能逐漸式微。當然，這種現象也是考證學盛行的重要前提³⁹。

比較井上金峨與吉田篁墩的學風，則有一個重大的差異而值得注意。此乃是與清朝考證學有無關係的問題。篁墩極其推崇清儒的著述，尤其稱讚余蕭客《古經解鉤沈》等三書爲其中之傑作。至於同門的山本北山亦研讀毛奇齡等人的著作。但是其師井上金峨則完全沒有提及清儒，其謂：「古今學術之變，立言之異。」如此，但「陸、王自程、朱出，物氏自伊藤氏出；而陸、王之異程、朱者十之一，物氏於

³⁷ 《師辨》與《經義緒言》、《震城講義》皆收載於《續日本儒林叢書》第2卷。

³⁸ 引自《金峨先生焦余稿》，卷5（《續日本儒林叢書》第3卷所收）。

³⁹ 前文敘述醫家與考證學的關係密切。（參注¹⁴）至於因爲考證學的廣播流傳，「町人（庶民）學者」的產生，亦值得注目，如狩谷掖齋、市野迷庵、松澤老泉是商人，松崎謙堂則是百姓出身。

伊藤氏者大同小異。」則於明學之後，即繼之以仁齋、徂徠，而未及於清儒（〈經義折衷題辭〉）。與金峨同一時代，也同為折衷學派之代表的片山兼山（1730-1782）亦與金峨相同。兼山以為孔子沒而道衰，漢儒之注皆不得正義，宋學雖欲匡救之，卻落入道佛。元、明皆不過帶髮之僧而已。伊、物雖知宋之非，亦未達孔子之真義。以古書解古書，則未必據傳注，必考證諸家而正誤耳。此兼山代表作《山子垂統・自序》的大意⁴⁰。兼山考證性的事業，是尾張藩《群書治要》校刻的參與，唯未見其完成而身卒。金峨與兼山之論學皆未及於清儒之學的共通性，此與金峨門下之篁墩、北山等人之明顯差異，誠意味深遠而值得深入研究。

大田錦城於經學三變的論述頗為有名。錦城以為經學研究「有漢學焉、有宋學焉、有清學焉」，則以清學為經學之一。至於「漢學長于訓詁，宋學長于義理，清學長于考證」，則以漢學總括漢至唐的變遷，宋學蓋括宋至明的流變，清學亦有漢、宋之學，而有清一代的學問，乃以考證見長（《九經談》，卷一）。由此可知錦城對清代學術有精當的見解。當然其對考證學亦不無得失優劣的品評，唯此並非錦城一人的見解而已，錦城及其友人皆不能無視清學的存在，進而汲取清學所長，從事學問的研究。井上金峨至錦城之轉變，誠蘊藏著考證學派成立的奧秘。

稍早而體認清學價值的是那波魯堂（1727-1789）。那波魯堂生於寬政元年，約與金峨、兼山同時而稍晚。其謂：「清朝之學，博讀經史，……考合諸書衆議，明是非之正當，以得程、朱之真為旨，往往有勝元、明諸儒之說處。陳廷敬、顧炎武、萬斯大、徐乾學、朱彝尊諸人，其選也。清人之著書有益者多。昔無此書時，無而濟，今則不可不讀。」（《學問源流》）魯堂是朱子學者，其論述的主旨固在於「得程、朱之真」，雖然如此，其亦以清學見長的優點於博識與考證。魯堂初學於岡白駒而治古注學，其後以朱子學為宗。其所以留意清學的卓絕，或與其具有古注學的素養有關。

魯堂又兼述徂徠學與明學之流行及其變遷。魯堂以為「仁齋父子之學本於明吳廷翰之見識」。至於徂徠亦學於明人之古文辭學⁴¹。徂徠以李攀龍、王世貞之七子詩文為中心，而博覽明人著述，是必然的趨勢。享保中，風靡一世之徂徠學的流行，即在於明人著述的宣揚。「唯云或明人之著述，或徂徠之校正，則求而藏，爭

⁴⁰ 伊藤東涯的《古今學變》亦綜觀學術史的發展，而分為漢、唐、宋、明。卻只止於陽明學。

⁴¹ 錦城謂徂徠之學出自於明楊用脩（名慎，號升庵）（《九經談》，卷1）。

而讀。中葉以來多少考索之書，一言而云徂徠其為非，則無見之人，同于爛堆古紙。」然好景不長，「自寶曆初年(1751)之比，稍疑徂徠學之人多，專學之人少」(《學問源流》)。錦城亦稱：「享保年間，赤城(徂徠)之學大行。」然「至于天(明)寬(政)之間，其學索然，水落石出，書肆苦其書不沽」(《春草堂集》，卷十一，〈刻東涯先生閑居筆錄序〉)。徂徠學之衰微，即明人著述之式微，是可以想見的。至於代之而起的，或即清人的著述。

錦城說：「聖人沒二千年，其遺意唯在言語文辭之間。故不精字句，則不能知聖人之妙意也。字句考證之學，是清人之所長也，明學空疎，考據荒廢。……得清人之書一卷，勝得明人之書百卷矣。」(《九經談》，卷一)此即棄明學而就清學的宣言。明學轉移至清學的趨勢，大抵與徂徠學的衰微相並而來，其決定性的關鍵，即在天明、寬政年間^{④②}。至於考證學成立的契機，亦在於此一學術風潮的轉換而帶來的。徂徠門下所興起的考證性的學風，在徂徠學衰微後，全盛而開花，可以說是學術史的滑稽現象^{④③}。再者，明學至清學的轉換，也可以視之為日本文化史的一個轉型。茲探討開花結實之考證學的學術性格，進而論述日本學術分裂的情形。

在簞墩、掖齋的學問中，既已顯著呈現，又考證學流行的現象不能不承認的，是儒學之踐履之學的意義，或實踐性的實用功能，幾乎盪然無存。錦城、敬所之所以困惑的是，既要研究考證性的學問，又要遏止實學式微的現象。只有考證學是無法力挽狂瀾，要維繫儒學之本義所在的「實學」於不墜，非仰賴考證學以外的學問不可。錦城之所以講述宋學或陰陽的效用，敬所之所以提倡心學之實效而感歎儒學的無力，其原因即在於此^{④④}。結果，錦城、敬所自覺儒學的分裂及由於此一分裂而衍生的儒學式微的危機，乃欲以新的考證學，重建儒學的體系。

錦城以為當今儒學分歧為三，「有義理之學焉，有辭藻之學焉，有考證之學

④② 清學之成為主流，或與清人著述舶來的數量有關，當然與考證學的流行亦有相關。此雖非徂徠學衰微的主要原因，但是多種因素相交錯，導致此一時期形成學術巨流轉換的現象，則是值得注意的。

④③ 就學術史而言，徂徠以來的考證學的研究軌迹，即歷史性的探討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本文只就儒學發展進行探究，至於國學或醫學與儒學、考證學的相互關係，則是今後值得考察的課題。

④④ 猪飼敬所感嘆儒學無力者，於《猪飼敬所先生書東集》中，隨處可見。如卷二末，於教諭所講述詩文、心學，而曰：「儒者之為無用事者，益明而可見。」

焉」。義理者「精義明理，博辨宏道」，乃是「實學」的核心，具有實踐性的實用功能，故此義理乃是學問的根柢。至於辭藻則是花葉，考證則是培壅，三者兼具則是理想的所在。錦城說：「義理為本，文辭為末，考據，末之末也。有根柢而後有花葉，有花葉而後有培壅。花葉之不茂，則不得不假培壅。」即義理固然為本，考據為末；但是為了使根柢、花葉壯碩繁茂，則有培育的必要。亦即欲使辭理明暢，則不能捨棄考證。雖然如此，「執其末而遺其本，豈可乎」。但是當今之世，則沈溺於文辭，執著於考據，致使義理衰頹不振。錦城自謂「予亦以考證為家，平生之學，一在于此矣」；然則頗以現狀為憂，而亟陳義理之要（《春草堂集》，卷十一，〈刻東涯先生閑居筆錄序〉）。由此敘述，不但錦城之為考證學者的立場可以確知，考證學之為學問的定位，亦明確地指陳出來。更重要的是錦城以考證學為「培壅」，即考證學乃是學問的手段而非根本。

考證學是「培壅」（栽培育成）某者，而非某者的自身。就錦城而言，此某者即儒學的聖人大道。雖然如此，考證學的性質，卻無特定的必要。歸屬於手段、方式之技術性學問的考證學，其之所以考證的目的，則可以自由運用而無旁礙。因此，考證學的研究，未必只是儒學世界的專利，不但在醫學、國學領域開花結實，即使是書畫鑑賞之遊戲三昧，亦廣泛運用考證的手法，即是其證明。換句話說，考證學並非封閉的，而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具有客觀性、技術性、科學性之學問方法的考證學於此一時期茁壯成長，是不爭的事實。

義理之學、實踐性的實用之學所窮究的是事物的善惡問題，考證學所探究則是事物的真偽問題。篁墩、掖齋的學問宗尚是純粹的真實的追求。篁墩之校勘《論語》或有直接祖述聖人的想像，但是其止於《集解》，則無非是強烈地意味著其學問研究的嚴密性，換句話說，篁墩所重視的是《論語》的真實面貌。錦城則不如篁墩這般純粹，其考證學未必無為探究「義理之當否」而隱晦不明，如《九經談》卷二收載其有關《孝經》的疏解，即是一例。雖然如此，錦城到底認為批判性、實證性之真實追求，乃是考證學的第一義，《古文尚書》為偽作的考證，即說明此義。

錦城批評清人之漢學為「無用」後，說清儒考證「益於道義者雖少，於經學不無功」（《梧窗漫筆》，正編下），則分別「道義」與「經學」為二。又其雖辨明《古文尚書》為偽作，但是偽作之《古文尚書》，「切實于人事治道之事多，……不可廢棄」（《梧窗漫筆》，後篇），進而說：「真偽之論與用不用殊。」（《九經談》，卷七）即在缺乏實用性之考證學流行的時代潮流中，錦城雖強調堅守根柢

所在之「道義」的重要，但是「真偽之論」與「用不用」為不同層次的見解，殊為可貴。時人有《古文尚書》增多諸篇既有極多的嘉言，則毋需議論其真偽的存疑時，錦城答曰不然。錦城以為偽作即應辨明其為偽，然則有用即宜善其用。錦城說：「故辨真偽與論用不用殊，增多之偽可辨，而其書之用不可廢，是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九經談》，卷七）即探究真偽之考證學與追求實用性之實學雖有區別，而二者並行不悖。考證學乃別出於實用之學的領域之外，而有其探究真偽之獨自的空間，此乃是錦城對考證學的定位。換句話說，考證學雖是虛學而非實學，卻有其科學的、實證性追求真實的學問機能。錦城既體得考證學的實證性治學方法，亦感悟考證學之為學問的界限。

考證學的學問特質，大抵由以上的敘述而得以明晰。考證學於日本學問精神的發展史上，具有極大的意義，亦可以理解。畢竟脫離實用而追求客觀性真實的精神，是從事學問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即使考證性學問只止於古籍的考索，亦是先賢自覺地以科學的精神從事學術研究的結果。在考證學成立之前，此一學問精神是否已經開花結實？考證學之形成學問流派，而流行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其對後世的影響必然不少。諸如此類，尚待考索探究的問題甚多，留待日後再做研究。茲就此擱筆，尚祈方家叱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稿，一九八二年十月補訂）

附記：本稿待刊之間，加地伸行編《皆川淇園、大田錦城》（《日本の思想家 26》，明德出版社，1986年）出版。岸田知子述錦城傳記而用錦城門下福島留吉的記錄，以敘述錦城晚年的生涯，又鹽出雅論述錦城的學問而詳述錦城的《大學考》，皆頗有特色。又《日本の考證學》（《東方》22號，東方書店，1982年）則是本稿的節本。

（一九八七年十月）

——譯自源了圓編：《江戸後期の比較文化研究》（東京：ペリカン社，1990年1月），頁38-88。